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5月30日第51期

本期目录

【知青专辑】

热点研究

马昌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逆历史潮流的反现代化运动

书海泛舟

金大陆、金光耀 我们都是“志愿者”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跋

杜良怀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流逝的记忆》序

愚 乐 难忘，并非因为美好——《流逝的记忆》序

杜良怀 姚荣国 肖伯男 编著 《流逝的记忆》目录

王在平 五七梦引领我走上知青路（《流逝的记忆》选读）

杜良怀 路碑——一年零八个月的浪漫与终结（《流逝的记忆》选读）

生逢乱世

杜显怡 青春岁月里的荒谬与真诚——知青生活的回忆与反思

友情链接

邓 鹏 文革前大巴山重庆老知青下乡五十周年纪念会致词

旧曲重听

曾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大案的《南京知青之歌》

【热点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逆历史潮流的反现代化运动

马昌海

按：本篇原稿曾被摘录 7000 字发表于《理论月刊》2009 年第 5 期。这里发表的是全文，这次发表前又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马昌海，中国近现代史退休教师。1950 年出生于上海。1968 年北京八十中初中毕业后，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白音郭勒公社插队落户。1972 年转至湖北安陆原纺织工业部“五七”干校，进安陆五七棉纺厂务工。1978 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1982 年分配至原化工部化学矿山总公司中学（河北涿州）任教。1985 年以后在北京服装学院任教。1986 年 3 月～7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国革命史”进修班学习。1987～1988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摘要：由于城市财政、粮食物资供应和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世界城市化进程相反的道路。在彻底否定文革前 17 年教育的前提之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被赋予了强制动员性的政治涵义，这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现代化运动。这一代人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难以补偿的。

一 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能够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只有农村；在农业现代化中不断产生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其中有不少就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一大批农民也就地逐渐转化为城市居民。在如今的美国，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 2～3%，由于生产经营的机械化信息化，采用高新技术的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

而在我国，随着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 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 883 万人，到 1978 年减少到仅仅 15 万人（见中国统计年鉴 [M]. 1985. 213.），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这就造成了有人无

事干、有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中共执政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据统计分析：当时的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 1.6 万人，用在重工业就只能容纳 5000 人。五十年代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

再次，在中共执政后近 30 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当然，造成就业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多生了数亿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额为八亿人，是整个欧洲劳动力总额的一倍。这是建国后由于政策失误而留下的最大遗产，恐怕 100 年都难以化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对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执政者只好安排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

这样，在 20 世纪后半期，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知青回乡、下乡，早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郑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下了一段批示：“组织中學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经国家统一部署，全国有很多省市都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组织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志愿垦荒队，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如北京青年参与开发北大荒；浙江温州青年开发大陈岛；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参加新疆军垦（1964 年 10 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那里面优美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传遍全国各地。1965 年，成绩优异的武汉高中毕业生易中天，受苏联小说《勇敢》的影响，放弃高考，自愿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关怀下由城市知青为骨干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文革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 13 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文革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 130 万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 1962—1966 年下乡的，他们中有很

多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就有相当多的人属于这种情况。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更多，当时的回乡知青中有吕玉兰、邢燕子、董加耕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

在志愿下乡的城市知青中，出身于北京工程师家庭的侯隽是榜样，其中还有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以及张木生等高级干部的子女。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2009.10）。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0月18日，周恩来在《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的晚会上强调：知青下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长期不是三五年，要搞18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对团的工作的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10.23）。

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邓小平总书记说：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方法，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十几亿元，这怎么得了？他说，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周恩来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6页）。

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

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文革，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从中共执政后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如 1958 年大跃进时两千万农民进城务工，继而又将两千万人遣返农村，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

而从 1964 年起直到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涵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在彻底否定文革前 17 年教育的前提之下，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发布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种更不人道的做法造成了更大的悲剧，知青必须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去“接受再教育”，而不是留在城市里接受更先进的教育。这种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一代人，严重降低了中国的人口素质，学术界、科技教育界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状况也由此而出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可能走向工联主义。必须由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进行灌输，工人阶级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本人也曾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1366 页）。必须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44-245 页）。因此，毛泽东主张由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理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有少数人由于学习成绩不好而被迫在初中阶段就退学，进工厂当了工人，文革中成为“必须领导一切”的“领导阶级”成员。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却在文革中被迫中断学业，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文革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要求“复课闹革命”后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当文革的风暴骤起之时，许多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曾掀起了一股“返城风”，以表达他们在农村数年内所积蓄的不满。作为十年文革的组成部分，从1967年10月开始兴起的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淹没了文革前下乡的一些老知青为返城而掀起的小小波澜。它改变了一代人的生路，也影响了整个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这股浪潮的浓烈色彩几乎掩盖了一场长达20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来的黯淡之色，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以为，这种明艳的色彩就是它的本色。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书中的统计资料，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1947--1952年间，到1968年前后下乡或回乡时，年龄在16--22岁左右。这就是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这其中家在农村的青年学生要远多于城市青年。（下图：当年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画）

文革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是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学生毕业分配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内，在文革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



多达400余万的城市中学生们，竟然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遍及全国的偏僻村庄和遥远的边疆。这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这实在是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壮举，单单靠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比如办学习班、吊销城市户口，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和街道居委会轮番上门劝说和威逼，由家长的工作单位出面施加压力等等。除了少数先锋者，多数城市中学生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他们还是上路了。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就逐渐压倒了原先的自愿原则。

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作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当年最普遍有力的口号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在“大风大浪”

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种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才能够在从城市里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相互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这些知青们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可耻，使他们能够注意磨练自己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农村，一些人为了救火、抗洪、抢救生产队的财产和物资而奋不顾身，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如闻名一时的上海知青金训华、黄山茶林场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 11 位上海知青等）。

知青们在道德上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媒介“净化”的宣传，曾导致了不少人生的悲剧，这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有些甚至生活在一些性观念相对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对知青的管束要严格得多），而且当男女知青们因前途渺茫而倍感精神空虚和失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却能够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应该归功于当时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上千万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得多。

当然，文革中红卫兵出于愚昧和狂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害，建国后 17 年的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壅塞在城市里的青年之所以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地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向社会，造成更混乱、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文革前 17 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使“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引为骄傲的。他们是富于牺牲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人，如果他们以坚韧的意志所付出的辛苦与汗水不是仅仅消耗在为了温饱而从事的简单劳作之中，他们一定会有益的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及文化教育事业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到 1980 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正如有人所说的：国家花了 300 多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却换来知青、家长、农民的“三个不满意”。国家对城市知青的安置费并不完全直接发给本人，而部分由基层和生产队掌握。这是一笔纯消耗性而非生产性、建设性投资，徒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浪费。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他用，遂成

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反而加剧了知青与地方的矛盾。

多数知青下乡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许多孩子在下乡时尚无独立自理能力，无可奈何的父母只能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默默忍受着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徒令华发早生。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现代化运动，对此只能从整体上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里，知青与众多农民一样，其基本人权至少在五个方面被剥夺或践踏：

- ①温饱权；
- ②受教育权；
- ③择业权；
- ④选择居住地权；
- ⑤满足文化娱乐精神需求权。

到东北建设兵团的知青，虽然东北产粮区的主食可以不限量的，但冬春半年的副食只有土豆、咸菜、酸菜，基本上没有肉食；再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他们备受煎熬。“棋圣”聂卫平曾经一顿就吃了 20 个大花卷，连女生一顿都能吃 5 个。在风光绮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的知青陈凯歌回忆：知青们长满厚茧的手可以拿着烧红的煤核点燃香烟、光脚也能够遍布尖石的山路上飞奔。在砍伐原始森林的艰难劳作中，一个 16 岁的上海少年被三人合抱的巨树压死；一个少年逃入河里仍然被原栖息于巨树之上的成群的大马蜂追逐蜇死。在内蒙古草原，一年四季都面临的饮水问题，许多人几年都未能洗个热水澡。冬天睡觉须戴着棉帽，醒来只见被口的一层白霜。一年四季只有盐、羊肉和小米，没有葱姜蒜、辣椒花椒大料，没有酱油醋，更没有一点蔬菜水果，连一点咸菜都是稀罕之物。主要燃料就是靠漫山遍野搜寻到的干牛粪。

在陕西、山西、甘肃、宁夏、云贵川、山东、河北、河南、江西、安徽、两湖、江浙、福建、两广等省区下乡的知青，大多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劳动强度高，居住条件差。交通不便，环境闭塞。

除了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之外，很多知青生活中最大的难处除了吃饱穿暖外，还有洗澡和如厕这两大难题。内蒙古知青对此就深有体会：夏季绿草茵茵，到处是成群的苍蝇；冬季白雪皑皑，在零下 30° 的呼啸寒风中，在野外解手是个什么滋味？

我至今还记得坐在蒙古包里，翻看一本破烂不堪、无头无尾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一点感受：保尔·柯察金在战场上负了重伤被送回其乌克兰的家乡，在其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经过一个漫长严冬的苦熬，终于战胜了病痛。当

他能够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当保尔终于能够又一次站在窗前，向窗外树枝上唧喳鸣叫的小鸟问好的时候，面对着万物复苏的大地，他感受到生



命的力量。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元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动身离开家了。母亲一边替他收拾行装，一边擦着眼泪：只有在保尔遭遇病痛的时候，她才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当儿子养好了伤病，羽翼再次丰满的时候，他就要像窗外的小鸟一样飞走了。“他生活的根已经从乡村拔走了，他喜欢城市里叮当作响的电车，喜欢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喜欢城市里嘈杂的喧闹声，喜欢看上下班时如潮水一般的人流，他向往着城市中火热的生活。”

当我读到此处时，不禁有些疑惑：我们被大批送到农村来，是对的吗？如果我们像保尔一样，向往城市的生活，这有什么过错吗？（左图：本文作者当年在内蒙古当知青时留影。）

二 知青的贡献与收获

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农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知识，兴修水利、建小水电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知青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乡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基层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一些哪怕仅仅是低水平的农业科学实验和生产技术革新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一些农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普遍轻视知识并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农村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使用简单劳动工具、与勤劳朴实的农民从事同样艰苦体力劳动的知青们，其有限的知识优势也是难以发挥的，更何况这些知青也不过是一些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学生而已。与国家现代化机遇和人才的丧失相比

较，知青们对农村的贡献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我一直存疑：这样一场长达 20 年，涉及到近二千万城市知青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带着一种民粹主义色彩？在一味美化劳动人民的社会氛围里，农村落后的传统文化习惯势力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一些素质低下的乡村干部对知青的反感和歧视；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对知青的疑忌、戒备、排斥心理及偏见（列宁说过，小生产者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心理）；也使知青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失望和迷茫。知青也看不惯一些农民的消极怠工、不讲卫生、自私、狭隘、保守和落后，一些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也会引起知青们的反感和不满。事实上，绝大多数当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既不情愿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识青年的能力。

知识青年在下乡以前所接受的是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教育，教育者始终没有将社会落后和阴暗的另一面如实地披露。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封闭、肮脏和愚昧，对知识青年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知青们到了农村，才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些知青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农民都是爱集体、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我们被送到农村来，就是要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练，接受广大农民对我们的教育和改造。从城市来的知青们在一开始还不能理解：在人民公社大锅饭的体制下，农民在出工干活时，普遍偷懒现象的必然性（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体制下，有很多城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1968 年底，我在锡林郭勒草原落户四个月后来到了西乌旗（县）政府的所在地，在一个黑乎乎的大车店里睡了几十个人的大炕上，见到一个志愿军老兵，刚刚在民政部门领到每年一百多元的伤残军人抚恤金。他在炕角一边喝酒，一边挥舞着伤残军人证狂喊乱叫，得意之极。看着老兵那副肮脏愚昧的形象，我不禁愕然：这就是当年“最可爱的人”吗？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在离开部队以后，又回到了贫穷落后的乡村环境里，常年为温饱而辛苦劳作，你还能要求他具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吗？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改造，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

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1956 年的合作化、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真实情况，看到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如全国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那一套“自报公议”评工分的极左做法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继续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它书籍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文革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先驱者，建国后 17 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批判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三 接受再教育与“小共产主义”尝试

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屯垦戍边”、亦兵亦农的生存状态与下乡插队有很大差别——

(1).他们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居住房屋建筑，发军装，在连队食堂集体就餐。其基本生活需求还是有保证的。

(2).建设兵团里在一起朝夕相处的是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区的知青，而分散插队的知青集体户大多是由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所学校的学生组合而成，文化背景、生活习性更为相近。

(3).插队知青尽管生活拮据，半数以上不能自给，但生活环境比较宽松。乡村中的社会关系普遍松散，社队三级都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对插队知青无从控制，管理松懈，大多放任自流。知青是否参加劳动，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频率及时间的长短，都主要取决于自己。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处于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之中，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没有随意休息不工作的自由，更不准随便回家探亲或逾期不归，令许多知青难以忍受。建设兵团的知青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人员流动上也受到比插队知青更严格的限制。

(4).建设兵团的政治气氛更令人窒息，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文化素质偏低、出身于贫下中农的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和老职工身上。一整套“左”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以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得以大范围推广，保证了“再教育”工作的持久开展，而广大乡村的“再教育”工作大多虚应故事。上山下乡使知青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在那些贫穷、善良、淳朴、坚韧、宽容、生命力顽强且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一些纠正和改变，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对知青们的心灵无疑有着极大的净化作用。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在扭曲的时代里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

对于大多数插队知青来说，集体户是由一群未婚青年男女组合的社会单位。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住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分，并按照个人的实际劳动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性别、体质、技能、适应能力和劳动态度上的种种差异，造成了收入的差别。知青本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也直接影响到知青的生活水平。但无论这些差异多么鲜明，他们却要在集体户统一办的集体

灶合伙吃饭，同时分担集体户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男女知青的饭量不同，集体户成员回家探亲或因病误工（也有不出工的）更是普遍现象。种种差异造成了集体户内部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集体户履行生活管理职能的难度。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集体户知青是按照他们在学校中所受到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来处理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一些集体户曾经试行过“小共产主义”制度。“小”，是指其范围仅仅限于本集体户，其实质则是艰苦条件下在分配上实行的平均主义原则。在集体户内，口粮和工分统算，轮流担水做饭，其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就连偶尔收到家里的包裹也是大家分享。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或在原籍同一个居住院落的基础上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增强了“小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当一批批满怀豪情壮志的知识青年在贫穷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革命战争年代“战时共产主义”生活的时候，在精神上也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这种“吃大锅饭”、“合作互济”的经济管理分配方法，尽管在下乡之初对稳定知青的基本生活需求起过一定作用，但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条件，也不能顾及知青本身的差别和实际利益，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这就注定了其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结局。而后，知青们普遍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领取个人报酬，同时共同负担集体户的公共支出。以此同时，知青之间因闹纠纷而导致集体灶散伙，生活、劳动自顾自的现象就越发普遍了。

知青集体户起始出现的“共产风”，其历史条件源于长时期以来学校里实行的理想主义、革命传统、集体主义、阶级友爱教育，其现实条件则是文革初期平均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的高扬。这是在特殊条件下才会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最终，这种“乌托邦”倾向被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扫而光。当年相互理解、友爱、扶助、同甘共苦的生活经历，也成为知青生活中的美好回忆（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126 页）。

四 知青对农村的负面影响

“上山下乡”是一场充满幻想的乌托邦运动，知青下乡前曾被刻意渲染过的乡村田园景象所吸引，往往以为乡村充满玫瑰色的浪漫情调，许多知青读过一些古典诗词，就更易把下乡接受再教育视为一种诗意生活。可实际情形却是，知青一旦嵌入农民群体就会自动流于边缘，长期处于被漠视的状态，因为农村多为同姓村，本来就排斥外姓，对精英知识的需求度很低，加上来自不同地区的知青在语言和习惯上的差异，使他们经常成为不中用的“过路客”。知青不懂农业常识，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对人口过剩严重的村庄更是沉重的负担，最终还可能引起乡

民的嘲讽甚至敌意，知青在与当地农民的相互摩擦中曾发生过不少悲喜剧。知青对农民的报复也时有发生。

南北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历年大规模的垦荒和砍伐，对当地森林、草原植被及湿地所造成的破坏，至今没有看到过全面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据悉，如今北大荒三江平原的湿地已经减少了 70%。

城市知青来到地少人多的农村，实际上是与农民抢饭吃，加剧了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矛盾，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实际上，半数以上插队知青的劳动所得也根本无法自给。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到农村后突然摆脱了以往在城市里所受的管束和道德规范，其人性中不道德的一面恶性发作。他们在农村偷盗生产队集体和农民私人的东西，不把农民当人，还与农民发生打斗。在下乡之初，有人甚至将城市文革中那一套阶级斗争的方式带到农村，参与派性斗争，在民风淳朴的农村搞极左的一套做法（如在内蒙古农村大抓子虚乌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更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报复。还有的知青卷入了当地争夺生态资源及宗族、民事纠纷，伤人害己。在有些地方，由于知青对当地人的鄙视或有的知青做了损害当地人利益的事；而一些当地人本来就不欢迎知青，因为知青的到来加剧了各种经济、政治资源的紧张状况。再加上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出于对城市知青的嫉恨和对某些知青不良行为的不满，一些旅店、车站、邮局、商店、粮站、饭馆的服务人员歧视和刁难知青；有些当地的农民、干部和恶少还欺负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此知青与当地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在西双版纳就曾发生过一起知青集体暴力袭击事件：在一次赶大集的时候，一些行踪诡秘的知青悄悄在一些平日与知青为敌、结下怨仇人家的房屋墙壁上做了特殊的记号。黄昏之前，就在赶集的人们刚刚散尽之时，上百名知青突然在同一时刻从隐藏的角落中冲了出来，手执棍棒、农具，兵分数路，偷袭打砸了那些墙壁上画了记号的人家，实行报复和惩罚。就如同开始时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总共不到半个小时，上百名参与袭击的知青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事后参与此次事件调查的一位景洪州军分区参谋说：“策划、组织和指挥这次袭击的人，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这件事到最后也未查清是谁组织干的，不了了之（见邓贤：《中国知青梦》）。

五 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

比恶劣的生活条件及生产环境更可怕的，还有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明争暗斗与欺压。定宜庄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一书中对此也有过分析：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

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在理想主义下，亦有一己而出人头地的私欲；草菅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这本来并不奇怪。这一代人也应该有自省和忏悔：当年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夸大与宣传，这种违反一般人本性的过高要求，使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为：即使是正常地为了自己，也是与“革命”不相容的。他们只知道牺牲自己是美德，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应该珍视的，更不知道个人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并不反动。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种追求就是正当的。然而，人的欲念和追求是客观存在的，是无论怎样教育、改造也压抑不了的。无论是我不敢正视，还是明明知道却设法掩饰，它还是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而问题却在于：一旦这种欲望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伸张的时候，它就要以扭曲的、不正常的、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出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有的人还会以要求进步、靠拢组织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报告，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揭发、举报和诬陷他人。

六 成为社会严重问题的知青婚姻

据安置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1977 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 3.8%，而国营农场（建设兵团）知青的已婚率为 22.7%（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5 页）。其原因在于插队知青生活条件太差，且流动性大于国营农场。其中占主导型的是知青与农民



婚姻（女知青嫁给农民明显多于男知青娶农村的“小芳”姑娘，两者大约相差一倍），其次是双知青婚姻（生产建设兵团里的知青集中且朝夕相处，各个连队在广袤的荒野上天各一方，其特殊的相对封闭的择偶环境造成了以双知青婚姻为主的状况，插队知青中也有一些，但不

很多），再次是少数女知青嫁给城镇职工（包括军人）。（上图：当年歌颂知青上山下乡的油画《春风杨柳》，谁能想到这些充满美好憧憬的笑容将迎来怎样的命

运？)

在这三类婚姻中，双知青婚姻的感情基础最好。“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爱情产生于动荡的年代，艰苦的岁月，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沉重的生活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但知青家庭婚后一般在经济上难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少数女知青嫁给城镇职工（包括军人）一般多是父母亲友包办撮合，目的就是回城，缺少感情基础通常为其致命伤，由此埋下了苦果。

知青与农民的婚姻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在婚姻被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里，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被吹捧为“扎根农村”、“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是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实际行动”。

农民的本性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知青在极其沮丧之际，从农村青年的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就多数女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于被动的选择。当年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知青的著名影星刘晓庆在《我的路》（《文汇报》1983.6）中回忆：“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我挖地，只要坚持8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农村姑娘在结婚以后往往就不用下地干活了，而女知青的体格、群体意识及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都相对较弱，在心理意识上也更脆弱，一些知青集体户的破裂更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再加上下乡之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渴望爱抚、友情、关心、照顾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刘晓庆所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她也就幸运地没有能够成为那种特殊环境下婚姻的俘虏。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血统论”的巨大压力。最早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有很多都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和资本家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不少知青因家庭出身饱受歧视，她们便嫁给贫下中农的儿子，以期改换门庭，脱离苦海。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下乡女知青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当地农民娶城市姑娘为妻，不仅可以炫耀乡里，还可以省下一大笔彩礼，对农民来讲当然非常合算，却往往造成了女知青的终生痛苦。这种婚姻大多缺乏

感情基础，双方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社会经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在上山下乡运动后期“返城风”的猛烈冲击下，此类婚姻有很多以破裂告终，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由于将近半数的未婚知青已陆续调入城市，而已婚知青却基本滞留乡间，下乡知青的实际已婚率一般应低于 10%。由于男知青在招工、招兵中占有优势，留在农村的未婚女知青的人数远多于男知青。无论是在国营农场（建设兵团）还是在乡间插队，许许多多的大龄知青，首先是女知青，多会为姻缘难结而陷于苦闷之中。光阴转瞬、韶华易逝，多少老知青还从未体验过初恋的激情，青春便已离去。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其无形的利爪制造了多少并非自愿的旷男怨女，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做了那个理想主义神坛的殉葬品。

七 知青不可能从整体上变成农民

“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逐渐成了一句空泛的口号。首先，知青是一个相对流动的群体，不断地有人离开农村被招工、提干、参军甚至上了大学，又不断地有新的知青陆续来到农村。其次，与土生土长的农民相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们承受苦难的生存与应对能力更差。因其有与城市文明生活的比较，知青们对苦难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切，更不像农民那样逆来顺受地认命。知青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农民的思想境界，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城里人，农民也从未把知青视为同类。知青与农民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是一个从未解开的死结。在长达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中，也有个别知青逐渐回归原始和落后，变得越来越像农民，而更多的知青却始终是在一种不伦不类的状态。一些知青们只是感到自己在农村苦，只想着如何早日跳出火坑，对农民世世代代的苦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在常年累月无休无止艰苦劳作的煎熬下，许多知青深感前途无望，因而思想沉沦、精神苦闷。

城市知青到农村，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调拨的安置经费及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而且挤占了众多农民子弟及回乡知青招工、招兵、上学、提干的名额和机会，对农村青年来讲，这更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当然，也有一些回乡知青和乡村干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机会搭车，同知青们一起进工厂当了工人。据统计，在 1966—1976 年 1700 万知青下乡的十年间，有多达 1300 万的人从农村返流进入城市的企业和单位就业，其中知青约有 450 万人，农民约有 850 万人（包括原籍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和复转军人）。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8 页）。然而，同 1962 年以后下乡的城市知青相比，农民及回乡知

青在家乡农村劳动的年月是不予计算工龄的。

当年书写过著名反理性的义和团情结诗篇《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知青诗人郭路生（食指），在 1974 年却写下了《疯狗》一诗，映现出知青中的普遍心态：

受尽无穷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变成一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狗急它还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羁绊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八 悲壮而苦涩的知青返城

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的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从 1970 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有大约近半数的知青（736 万）通过“三招”（招工、招兵、招生）和“两退”（病退、困退）的方式离开农村回到了城市。要想通过以上方式回城，首先要家庭出身好，血统纯正；其次是要取得当地乡村干部的推荐、同意或批准。如果是知青的家里有权有势，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干部子女“走后门”回城或当兵、上大学的事例。当地农村干部的子女亲友和复转军人自然也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从外省区来当地下乡的知青难免会受到歧视。

多数招工、招兵、招生无望，“走后门”无路，没有机会离开农村的知青，就想方设法利用“病退、困退”的方式回城。建设兵团的知青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人员流动上受到比插队知青更严格的限制，“病退、困退”就成为其返城的重要途径。许多人为此不惜孤注一掷，久而久之，假冒现象愈演愈烈。尤其假冒重病的手段，各地知青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其目的均在于获得一纸有病的医院证明。其中有许多手段都是以残害身体为代价的，如服用麻黄素、升压灵造成“高血压”（会造成吐血和昏迷），喝 1% 的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

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有的知青为了早日挤入病退的行列，不惜滥用灰黄霉素，打肾上腺素、冬眠灵等药物，甚至往血管里注射柴油，丝毫不顾及后果！

为了回城，建设兵团、农场、乡村的各级干部、医生，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有关单位的人事部门都成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公关”目标，中共执政后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关热”悄然兴起，一直延续到 1970 年代末期。许多已经在当地就业和上学的知青，也纷纷要求辞职、退学，回农村恢复知青身份，以期回到父母身边（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0-312 页）。

1979 年元月 6 日 13 时，云南省勐定农场 211 名成都知青在绝食前宣誓：不回城，毋宁死！这些普通知青的举动，是自己拯救自己，呼吁改革的勇敢尝试。

与当地农民相比，知青终于能够回城当然是

幸福的，与留在城市的人相比，这幸福又是可怜的：其一、回城使不少原先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城市的恋人离散，更造成了一些家庭的婚姻破裂，有极少数人甚至将亲生骨肉狠心地丢在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些人生悲剧（这在叶辛的《孽债》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其二、回城后的知青面对就业、住房、子女就学所带来的困境及周围人们的冷眼和不理解，历经磨难（这在影片《我们的田野》、电视剧《雪城》、《年轮》等作品中也有过描述）。由于下乡插队在国家劳动人事部 1985 年第 23 号文件颁发之前不算工龄，这些年近 30 岁的老知青们只能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拿同一级别的工资。身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处于劣势的老知青们，却必须被迫与年轻的一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城市里一切从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人生拼搏。其中的一些人继续以顽强的努力，通过成人教育完成了学业并且凭借自己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和见识，成为各单位的骨干。



回城之后，由于年龄偏大、又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有的知青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当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知青这一代人在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并且普遍不具备再就业的能力。政策失误和改革的某些成本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很难予以补偿的。北京“宏志班”贫困学生的家长，有很多是返城知青；北京崇文区有一个靠人力掏粪和背粪的清洁队，专门负责因抽粪车无法进入的狭窄胡同厕所的卫生，其成员曾绝大多数是返城的知青。这些至今仍然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恐怕与某些人所讲的“城市贵族心态”是毫不相干的。现如今“三农”问题固然是重中之重，城市贫困人口的问题同样需要关注（详情可参阅《人民政协报》第4421期 张春莉文）。

知青回城当然是顺应了现代化潮流的趋势，而后农民的后代们也接踵而至，随着知青们的足迹进入城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当年知青们曾在偏远闭塞的乡村影响了那里的一代青少年，而如今农民的后代却主动地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真可谓沧桑巨变。前些年有不少知青返乡，再去看看那块留下青春岁月的地方。乡亲们真挚、淳朴的情感使知青们深深感动，也有人为了“第二故乡”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其中具备扶贫、救灾能力的只有极少数人。一些当地年轻的地方官见了回访知青，就常常会说这里的某个项目还有几十万或几百万元的资金缺口，希望知青们设法帮助解决。这种事遇多了就会令人厌烦。前些年《中国青年报》曾有过长篇报道《大宁知青的扶贫悲歌》，记载了一些原北京知青回山西省大宁县扶贫过程中艰难曲折的遭遇，以至最终惨败的原因和结果。关键是当地政府和老乡的观念错误，他们并不把回乡扶贫的知青当成自己人，对其扶贫活动并不给予必要适当的支持配合和理解。

九 难予补偿的成本和牺牲

这一代人曾有过短暂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辉煌”。然而，在他们追逐理想崇拜英雄并俨然成为历史主角的同时，其代价却是民族精神的沦落和文化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琐碎、平淡、无聊的农村生活，日复一日地消磨着他们身上的锐气、热情和抱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虽不愿意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历史注定了让他们这样度过这段岁月。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们步入中年之时，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却又一次让他们难以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适、冷落甚至遗忘。许许多多新的机遇，似乎都不是为他们所提供。面对许许多多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业已形成的观念、知识结构和年龄，已经不可能允许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做出理想的选择。在现实面前，他们便显出一代人的无奈。《苦难与风流》（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一书的封面上,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代人的无奈:“对老三届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他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知青一代人经历了中共执政后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是与共和国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加之执政者错误的决策和社会的转型,他们因此承受了高额的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当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付出了最大牺牲的,还是广大农民)。在童年或少年长身体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被送到文化落后的农村去从事艰苦原始的农业劳动,落下了一身的伤痛;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知青英年早逝。还有一些人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由于中断了学业,在农村也无书可读,很多人除了写封信以外,一年半载都不一定握笔写字(我就曾有过枯坐数小时而写不出一句会议总结的经历。由于草原地广人稀再加上语言不通,很少与人接触交流,连人的神情也显得木讷和呆滞了)。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反而走向了退化。

知青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来到农村的,有些品质低下的建设兵团、农场和社队干部,就可以在法制被践踏的大环境下,对没有反抗能力的知青任意欺辱、摧残、迫害。随意批斗、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在各地农村时有发生,各种残酷的毒打手段形形色色,无所不用其极。由于其户口、粮食关系都掌握在兵团、农场和社队干部手中,知青们想通过招工、招兵、提干、上学的方式脱离农村,都需要经过这些干部的推荐、同意或批准。因此,某些干部(特别是在知青比较集中且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制度的建设兵团的干部)对知青就享有了基本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有的人甚至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而在当时法制法规遭到严重破坏的年代里,知青们普遍缺乏有效保护自己的手段。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 5 个师长均有调戏奸污女知青的行为,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更为严重(国务院知青办:《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批材料》,《四个团级奸污凌辱女青年九十人》,1973 年 6 月)。在广大农村插队的知青,居住分散,管理松懈,女知青受迫害的问题尤为突出。湖北天门县 1968—1973 年安置下乡知青 1.3 万余人,共发生迫害女知青案件 203 起。约占该县下乡女知青的 3%。迫害女知青的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处理不力、量刑过轻甚至包庇罪犯(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组:《天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问题》,1973 年 7 月)。美籍华人女影星陈冲未经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许可,根据其好友、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原成都军区和南京军区歌舞团舞蹈演员,军旅作家出身,影片《梅兰芳》、《金陵十三钗》编剧)的作品,在四川秘密拍摄了

一部以女知青受性迫害为题材的影片《天浴》（主演：李小璐），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陈冲在事后也做了诚恳的道歉。众多女知青在农村被强奸、诱奸、侮辱、猥亵的事实，在许多知青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过反映。中共中央 1971 年第 26 号文件当时曾向全体知青传达，其中就有专门的一条，要审理破坏上山下乡、迫害知青的案件。李先念副总理下令枪毙了迫害知青的四个人，其中就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 18 团的连长张国良和营教导员蒋小山。中央 26 号文件传达后，各地都审理公布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为知青们出了一口气。1973 年 6 月 22—8 月 7 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会后不久颁发的中共中央 1973 年第 30 号文件要求：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最坚决的斗争。对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

据国务院知青办 1973 年 6 月《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批材料》记载：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强奸猥亵了 21 名女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女知青们听见老鼠跑，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的簌簌发抖，以至才有后来李先念副总理所说的那样：“如同日本鬼子一样”。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0 年云南建设兵团组建到 1973 年，18 团营教导员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强奸了女知青 20 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百余人。蒋小山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三代贫农，种过地、受过苦、扛过枪、打过仗、多次立功受奖，出生入死，救护战友，光荣负伤，参加过抗美援朝。如果在制度健全的部队里，上下制约，团结奋斗，他也许是个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但是，时代偏偏为他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识青年为己任。因此，农民出身的他在这里得到了为所欲为的机会和条件。

1973 年 11 月 28 日，云南建设兵团第 18 团营教导员蒋小山、连长张国亮等四名现役军人被押赴西双版纳景洪州公判大会会场，如同当年土改斗地主一般，成千上万的知青早早赶到公判会场上。当运送罪犯的囚车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缓缓驶入会场时，人们内心积郁多年的仇恨和怒火如同火山爆发，雨点般的砖头瓦块伴随震耳欲聋的口号飞向囚车，愤怒的人群好像汹涌的浪潮一般涌向前去，他们要把欺压他们多年的罪犯撕成碎片。昔日不可一世的罪犯脸色煞白，小小的囚车如同一叶驶入滔天巨浪中的扁舟，几乎被知青复仇的浪头掀翻。

好容易开过公判大会。行刑时刻，知青的情绪再次达到高潮，人们呐喊着扑向罪犯，他们不愿意国家再为几个罪犯浪费子弹。刑场总指挥紧张的额头渗出汗珠，他不担心死刑犯逃走，而是顾虑会场因混乱而发生意外。于是，他果断命令就地挖一个坑，罪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随着几声枪响，硝烟散去，历史把中国 20 世纪知青运动的巨大疑问和惊叹号深深地刻在共和国南疆这片古老和苍凉

的红土地上（见邓贤《中国知青梦》）。

据新华社通讯社《国内动态》1973年7月4日（第241号）《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中记载：

……第18团有31个单位，其中有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手段有25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跪砖渣，老牛板桩，（捆上后用钢筋搅），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

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联合调查报告记载：……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48人，被打知青110人，遭受30几种刑法，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11期记载：

1、拷打批斗：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兵团：自1968年以来有365起。自1969年以来有内蒙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

3、工伤事故：黑龙江兵团，死亡553人。1970年8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任何安全生产知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年第39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

内蒙兵团：事故928起，造成126人死亡，伤756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1972年5月，43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69人。

广州兵团：死亡210人。云南兵团死亡277人。

新疆兵团：1969年来，仅自杀就高达134起。

4、管理粗暴：内蒙兵团26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7元。偷一根甘蔗，罚款20元。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

5、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的处理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兵团1969年组建以来，共发生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411起，其中奸污案件207起，捆绑吊打案98起，凶杀2起，逼婚三起，打击报复5起，煽动外逃1起，死因不明3起，猥亵83起，强奸未遂9起，犯罪人员中现役人员占116人（师级干部4人，团级9人，营级31人，连级105人，参谋干事10人，其他7人），地方干部犯罪245起。兵团已处理179件，占43%，

其中死刑四件，死缓二件，无期三件，十年以上四件，九年以下十三件，行政处分 138 件，其余 13 件。

据邓贤《中国知青梦》所引用的资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多摧残迫害知青的案件。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女知青惨遭迫害？确切数字恐怕永远将是一个谜，没有人搞过此类调查。受过此类迫害的女知青们大多是忍气吞声。在极重贞操、仍然残留着封建意识的社会环境下，谁愿意去大事张扬？她们今后如何做人，如何嫁人？如何抽调回城？如何面对家人和亲朋好友？所以，因奸情偶然败露而为人所知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以我插队所在的公社为例，100 多名知青中约一半是女孩子，被军代表奸污而败露的有两人。2：50，也就是 4%。如果以此为比例做一个简单的推算，1700 万知青中若有 850 万是女生，4%就是 34 万！这不包括大量未曾败露或未经调查核实的案情！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吗？这是一种永远无法补偿的损伤。这对那几十万受迫害女知青的一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1975 年，由于严打只是治标不治本，各地迫害知青的发案率又有所回升，中央有关部门再次增强了打击力度，这是一个伴随着上山下乡知青运动十几年而始终未能根本有效解决的难题。(右图：《人民画报》1974 年第 9 期封面照片：扎根天津市宝坻县的知识青年们。)



另外，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还发生了大量形形色色的“非正常死亡”。

十 超越苦难情结

苦难有可能转化成人 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一些因靠其天赋、背景、关系、机遇和自身的努力，而走过了苦难的所谓“成功者”，惯常把自己过去的卑微经历说成是今天荣耀的资本，以炫耀其劫后的辉煌。于是，一种某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集体意识，就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有人说知青的苦难是一笔财富，历史以数千万人十年二十年的青

春血汗为代价，磨练出这一代人的意志品质。然而实际上，当时就有许多人自觉地认为：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响应党的号召，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应该吃苦和锻炼（“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对于苦难的深切感受和理解，有很多人都是多年以后才逐渐体味出来的。我们这代人拼搏的动力和奋斗的精神，来源于从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培养，下乡锻炼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种生活经历曾直接形成了迫切改变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但这并非是我们努力拼搏的唯一动力。

1962—1976年，下乡青年中共有82.56万人进入了大学、中专、技校（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1977—1979年又有约44万知青（还不包括以前当过知青的在职工人、干部和军人）通过恢复高考进了大学，1977、1978、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1977年共录取了27.2万人，其中有7.9万知青；1978年录取了40.2万，其中有27.1万知青；1979年录取了21万，其中有知青8.9万）。而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是1700万（还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只有不到10%的入学率，如此高额的成本代价，这不是一种悲剧筛选吗？如果因为这数千万人中出了为数不多的官员、作家、学者、艺术家，就将此归因于苦难的培养，而去美化和赞颂苦难，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反思。

这种苦难是对青春的浪费和吞食，这种苦难是不合理的、非正常环境下的产物。只有超越苦难，建立起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关怀精神，苦难才有价值。杭州知青女作家张抗抗就说过：“30年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在1998年时竟然搞成了一场热闹的纪念活动！我宁可不当这个作家，也不愿意当知青！”可见，知青生涯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折磨，对这一代人理想信念的沉重打击，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也正是那段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才使我们贴近并了解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懂得了中国的国情。在承受苦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在那个年代和环境下，人性中最阴暗卑劣和丑恶的一面，这也正是知青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震撼了中国城市中的大多数家庭，涉及到多数偏僻穷困的乡村，并且一直触及到一代青年的灵魂深处。面对如今急剧的社会发展变革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知青的故事似乎已经显得那么陈旧和遥远，以至于今天与我们当年同龄的青年人，大多已经不能理解“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比如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与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政策和重大事件都紧密相关，它的结束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标志之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的一代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销蚀

了自己无价的青春。

【书海泛舟】

我们都是“志愿者”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跋

金大陆 金光耀

按：《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历经五个春秋——并非自然的春秋，平昔的春秋，而是如同当年知青辛勤劳作般的春秋。《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煌煌然地问世了。

自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沈国明、阮显忠、张刚等主导者的运筹下开展工作，我们作为参与其间的专业工作者，深感其标树的知青史和知青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方向，不仅关涉这一代人持久的记忆和话题，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构成。

然而，检阅以往的研究，除了张化、郑谦、顾洪章、刘小萌、定宜庄及潘鸣啸等所奉献的开辟之作，继续在这块园地里立为学术标杆以外，多年以来，似乎少有出脱的后来者，或确有成效，或卓有建树地推进这项研究（知青群体的回忆录层见叠出，确实催促学术界思考这一问题）。即便有年轻的学人，意识到知青（即父辈）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程同频共振，进入这个切口，可开掘出丰厚的学术宝藏。但真正投身进去，因史料累积和理论建设之缺失，行前仍较为困难。

其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

毋庸讳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底座是历史学。这就是说，包括知青研究在内，若是没有历史学的准备和出发，即没有知青人口史、知青运动及政策演变史、知青社会生活史等方向的梳理和建树，以及知青劳作与工分、知青案件、事件与事故、知青婚恋与生育、知青疾病等专题的探究，怎么可能还原知青运动的本相，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呢！

况且，从史料学的要求来说，一般的片断回忆和口述记录，确实可在某些细节、场景等方面，提供很有吸引力的信息。但就整体而言，若是没有较大规模的方志利用、档案开掘和民间史料的搜求整理，即没有来自“深部和细部”的史料支撑，也难以建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述。

缘此，当我们完成编辑《知青研究文集》的任务后，就根据上海知青研究的特点，提议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上马两项体量巨大的基础性工程：《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和《上海知青在江西（黑龙江、内蒙、吉林、安徽、贵州、云南）档案史料选编》，以求从历史学的奠基的意义上，为全面提升中国知青研究的品质，汇聚中国知青研究的队伍，作出一份贡献。经阮显忠会长、张刚副会长，包括朱政惠教授在内的专家团队的论证，终于2010年拍板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我们当即表态：以志愿者的身份全程投入。

这是为什么？在当今研究机构的学术考评制度面前，编选史料的工作早已弃之如敝屣（考评为最低分值）。但一个学术方向的确立，一个学科群的建设，没有基础资料的积累怎能持久而坚实呢！没有人来承当开垦之劳苦，汇聚之烦难又何以可能呢！所以，想到编辑《辑录》的功效，将会吸引一批新生代学人，顺畅地进入知青研究的行列；将会催生一批以史料为根据的知青研究成果，来共同建设这块园地，确是实实在在的“功德”。

而后，阮显忠、张刚等一起拜会了通志馆馆长朱敏彦教授，希望利用这座全国收藏量最多的省级方志馆开展工作。朱教授不仅答应支持，后经申请协商，还共同出资出力完成此项浩大的工程。

接着，张刚联络了五十多位已退休的知青，在近五年的日子里，奔波劳碌，埋头苦干。完完全全、心心念念地将我们两位主编的“功德”融化了——我们为学术而“功德”的贡献，被一种更平凡、更朴实的奉献融化了——没有这批知青们每一页的翻阅，每一段的查寻，每一句的摘录，每一字的校正，哪会有今天的收获和成功呢！

培训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牛耕地”、“马拉车”的活。知青们说，你们扶好犁，拉好缰，我们努力往前拉。说得大家热泪盈眶。

查阅的时候，我们轮流在现场值班，解答各种疑难。知青们成群结队，起早搭黑，从大场、从莘庄、从虹桥、从北新泾……为尽早赶赴浦东的上海通志馆，以退休之身躯去填咽上班族的公交，继而，在昏暗、逼仄的库房里，埋头工作。从严寒料峭一直坚持到春暖花开。

复制的时候，我们坐镇辨析、校对。知青们弯腰屈背，登高爬下，库房里数千本的方志，不知被搬移过多少回。难怪通志馆工作人员说，建馆以来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地利用方志，往后也未必会有，堪称“空前绝后”。

回查的时候，我们整理文稿，开出单子。知青们则四处奔波，八方寻求，填补了许多疏漏。还有北京的知青到国家图书馆补查了上海缺少的方志。

核对的时候，我们做出样板，知青们连续加班，赢得了交稿的时间。

编制目录和索引的时候，我们数轮讨论拿出方案，十多位来自出版界、文化界的知青自告奋勇，参与工作。

还有许仲毅社长、曹勇庆室主任所带领的出版社团队，以一当十，不辞辛苦地做了很大的贡献。

每当我们向知青们表达敬意（已非谢意），知青们总是说：能为这一工程添砖加瓦而感到光荣，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此处的“自己的事情”——不是自己的私事——是自己曾经历过的一代人的生命史。所以，心甘情愿地将个人的时间、精力和智力，投入到这项无功利的工作中去。其实，这种默默的“个人的承担”，正是以志愿的精神，以担当的态度，指向了“公共的承担”，那就是为了这一代人的经历，为了这一代人的经历所书写的历史。

立正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十多位知青在退休以后，历经五个年头的春秋，参与这项史料《辑录》的工程，不正是为了知青一代人的春秋吗——不仅为了知青一代人曾经的春秋；更为了知青一代人（与共和国同时代）作为集体记忆和学术研究之对象的春秋。

二〇一四年九月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书海泛舟】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

——《流逝的记忆》序

杜良怀

每粒石子都来自岁月之河，
有的皴裂，有的光滑；
有的被浇注进马路；
有的被砌进大厦。
还有的
已碎成大漠之上的——
粒粒黄沙。
他们
深深地怀念着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

那块山崖。

这是我的校友、老知青王焰涛的一首短诗，而这本《流逝的记忆》，正是一粒粒石子对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的怀念。

《流逝的记忆》是老知青写“知青生活”的文集，它力图通过一个个无法消除的真实记忆解答一个疑惑：为什么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流逝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出的“知青情结”却能一直延续而不消失？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使“知青”和与之关联的“知青生活”成了极其独特的历史概念，以至于让我们的后代不能理解，甚至无法想象，但那却是个真实存在过的年代，真实存在过的一代人和他们真实经历过的生活。而将一个个真实的记忆留给自己，留给后代，留给历史则是这一代人的集体责任。

于是有了这本《流逝的记忆》。

书中《毒鸡风波》的作者李肇文认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何评价，许多专家学者见仁见智，随着更多的史料不断披露，对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实质会有更热烈的讨论，但理论研究和评价与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的心里感受却是不同的两个侧面，那段成长的苦涩记忆，对于每一个知青都会有与历史学家们不同的酸楚和考量。”这恰好点明了这本书组稿和编辑的主旨。

《流逝的记忆》不担负也担负不了评价这场运动的重任，因此没有收纳评论性文章，书中的作品全部是亲身经历过的、真实的生活和真实感受的记录，或全景，或片段，甚至只是一个小故事，它们多元化、多层面、多视角地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生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认识和感悟，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作为一个老知青和这本书的发起、编辑者之一，我读完了收进本书和因各种原因未能收入书中的全部作品，最大的感受是作品所表现的内涵并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某一种理论去归纳，更不能仅用某一种观点或看法去评判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中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单地说，任何“一个声音”都会失之偏颇。

虽同称为知青，同处于中国农村的大环境中，却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所经历的生活和遭遇有着很大的差异，每个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反思当年那段无法忘却的生活，有不同的认识毫不奇怪，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包含了似乎互不相容却又不可分割的矛盾评价：可以说那是个荒诞冷酷的年代，但同样也可以说那是个理想飞扬的年代；可以说那场运动是劳民伤财的人口大迁徙，但同样可以说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乡文化交流；可以说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但同样可以说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出了一代人。

书中的作品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王在平和柳英发是武汉同一所名校中的同届同学，下乡前同为该校文革学生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为本书所写的文章里又都讲述了他们自愿下乡的相同缘由，就是要亲身实践当时提倡的学生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道路”，“五七道路”源出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且和毛泽东“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固有思想一脉相承。他们一同下乡，在农村都整整务农了8年，一个“顶职”，一个“病转”才得以回城。在文章中两人的认识可谓截然不同，前者认为是场荒诞的“梦”，后者无怨无悔，感叹“壮志未酬”。

书中《始终不愿记起，却总无法忘记》的作者彭红霞是低我6届的校友，这届初中毕业生有40%可以继续留城读高中，她适合进高中却被强制下乡，她开始适应农村生活时又被强行派往水利工地，高强度的体力活压垮了身体，一场重病几乎摧毁了她和她的父母，她写道，上山下乡“就像是在健康的肌体上被强制性地注射了一种毒素，引起了身体的红肿、发炎以至溃疡。现在，这个伤口结痂了，留给自己的是一个刻在心口永久的伤疤和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同样是我的校友，李金山却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下乡时仅有16岁，先随同学插队，后迫于父母的压力转回老家务农，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农村里，他都努力去和农民相结合，而且结合得很好，连当地驻军的“徐团长”也成了他的“良师益友”。这是一个“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实例，他在《青涩的岁月》中说：“这段青涩的岁月，刻骨铭心，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奠定了我事业成功的基石。”

概括而言，欧阳光《走向春天》、冯森《拽车庙》、彭汉良《穿越厄运之门》、杨飞霞《梦的记忆》、杨家鸣《我的蹉跎岁月》等是悲惨和灾难的写照，王永宏《广阔天地里的两年牢》更是对黑暗的悲愤控诉。

而陶火清《一样路程两样情》、孙奇忠《进疆的第一个冬天》、金莉莉《我们曾经那样年轻——小记我短暂的知青岁月》、李武元《笔架山下》、张军《我的知青生涯》等展现出接触、了解和体验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劳动的必要及与农民之间产生的真挚情感，这些作者认为知青生活锻炼了他们。不可否认，因出身问题很多知青当年遭受到歧视性对待，甚至压迫，《山里的日子》的作者陈泽，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了7年，母亲因“申冤”在文革中被扣上“为特务丈夫翻案”的罪名，她“和弟妹就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母亲下放到乡镇中学任教，她在那儿读书，下乡，她写道：“在穷苦的农村、在辛苦的劳动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回想起来我毫无怨言，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磨练出勤劳、坚强、乐观、豁达的品格，这些品格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她说：“无论如何，山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永远都会存放在我的心头。无论那些人在天上还是在人间，我都要衷心地向他们道一声：谢谢！”

即使是同一个作者，在以不同的角度描写知青生活时，流露出的情感倾向也是复杂的。马伟的《天主的女儿》写了一个和一群惨烈的殉道者，不仅为自己，为家庭，同时在为这个国家、民族殉难。纯粹因为出版篇幅所限，而他的另一篇作品《小拐，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没有编入书中，在他的这篇作品中他深情地说至今眷恋的还是那片远在天边的土地，心中隐隐作痛的，还是那些黯淡无光而又回味无穷的岁月。他把鼓舞过每个支边青年的《边疆处处赛江南》称为军垦战歌，他写道：“这支歌属于那个时代，属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们当初太傻，但是我却至今不悔，不仅不悔，还暗自庆幸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岁月，让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满足，也学会了常怀感激之情。”

秋丽，知青生涯中遍体鳞伤，她的《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写了20个女知青为保护兵团猪场里的猪而被洪水吞没的死亡悲剧，最近她写给《小方》作者真水的信中认为：“决定了知青整体命运的最终结局是悲剧，且那悲剧的结果确实影响了一代人一辈子。但我认为即便如此，评价知青生活，即使揭示真相，也不应因此忽略了一代人，无论你是什么出身，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却能为信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这样的情操因在今天往后再也看不到而弥足珍贵。”

本书中更多的作品则完全不能用简单的概念化的主题词来概括。如丽珠的《苍天作证》，我感觉到的最大特色是把当年知青的苦难生活、特有的自然景物和社会背景揉碎，粘成一个个片断式的镜像，以升华和凝固她记忆中最强烈的感受。“绝望-----太像希望”，惨痛中的凄美使人震撼！

在写实中又极富文学色彩的还有戚伏生的《麦青、麦黄、那时斜阳》、朱德元的《我家在农村》、覃兄的《黄梅纪事》、张纯模的《乡情三题》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却有共同的特点，笔下的人物、事件都被浓郁的时代氛围烘托，那个年代中城市和乡村，尤其是城市里的世俗民风现今大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他们的文章中得以重现。像那幅《清明上河图》一样，这些作品留给后人的价值远超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评价。

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没有能被还健在的老知青一致认可的结论性评价，起码现在如此。而有一点是无疑的，关于知青运动的是非得失，肯定还是否定，赞美还是诅咒，对老知青来说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曾经发生并影响了我们一生，或者说，在我们一生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烙印。

知青运动是前面提到的当年“五七道路”在青年学生中最大规模的实践。如今，当年的一代知青正在老去。多少年后“现存的最后一个知青去世”也可能成为一条新闻出现在媒体上。最后一颗沙粒没有了，而且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

崖也已经风化得无影无踪，那时，在知青绝迹后的中国，会不会重现类似的“五七道路”呢？我们不能预料。

如今，我们只是记录下被称为知青的这代人的真实记忆。

2014-2

【书海泛舟】

难忘，并非因为美好 ——《流逝的记忆》序

愚 乐

按：《流逝的记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

我一九六八年底下乡，一九七五年中返城，在农村呆了八个年头。

我不是被迫下乡的。如果我愿意，我或许可以争取到政策照顾，留在城里。因为我腿有残疾。但是，我没有去争取。我不仅没去争取照顾，我还狂热鼓吹“上山下乡运动”，并积极投身其中。

我发挥了“榜样的力量”，影响了许多人。

我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执着地，或者说痴迷地坚守了多年，其间，还几度推却了返城的机会。

但最后，我还是回城了，带着从心灵到身体的累累伤痕回来了。

二

作为一名“资深知青”，农村生活的七、八年令我难忘。难忘，并非因为它美好，而是因它是我青春的终结。

我告别农村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我告别了农村，也告别了我的青春岁月。在那些岁月里，我曾壮怀激烈，充满献身热情。在“四个伟大”的光辉照耀下，我失去了，或者说，放弃了自我，完全不去考虑，**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那种热血沸腾的豪情，那种义无反顾的气概，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即使是迷狂的，看起来也是美丽动人的。它为我的青春涂抹了一道亮丽色彩，既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己。

三

然而，迷狂终归会过去，理性终归会复苏。这是万幸，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
摇滚歌手崔健唱道：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一块红布》）

当我从迷乱的梦境中走出，解下“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的红布时，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蒙眼“幸福”的虚假；

是革命辞藻泡沫下的一地鸡毛、一片狼藉；

是满眼残梦的废墟！

另外，就是歌中所唱的：“……我没地儿住……”

我，以及我们知青（据说有近 1700 万人），在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里被抛离正常的人生轨道，蹉跎数年后成了“失落的一代”（参看[法]潘鸣啸著《失落的一代》）！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始脱轨的那一点，让一切从头再来：上学，找工作，成家，育儿……

但是，不管我们费多大力气，想去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耽误的还是耽误了，失落的也还是失落了！

从头再来的一切，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都已经“没地儿住”了……

知青“上山下乡”，这场史无前例的城镇人口大迁徙，退去它宏大话语的神圣外衣后，显露出来的是伟人们最现实的功利谋略与最虚幻的乌托邦梦呓的搅合物。借助于强权的推行，它给成千上万知青和他们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

本来，文革就是一场灾难，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可不就是灾难的一部分吗？

四

当然，灾难中也能显现人性之美，就像黑夜里也会有黑夜遮不住的光——
亲情、友情、爱仍会在知青与农民，知青与知青间流淌；
勇敢、顽强的意志会在严酷的环境中大放异彩；
求知、探索与创造的动力不会因条件差而枯竭；

热爱生活、热爱美会让单调沉闷的日子里仍有歌声、笑声和舞姿……

但是，黑夜里的光再亮，它也没有将黑夜变成白昼。只是因为它在黑夜，所以更让人温暖、更让人珍惜、更让人难以忘怀，以至常常情不自禁地重温它，赞美它，讴歌它。

这样的赞美和讴歌不应当是献给黑夜的，而且，也不应与谄媚黑夜，魅惑人心的鬼蜮音符混淆纠缠，弄得黑白不分，美丑难辨。

我们不想让红布继续蒙住我们的双眼吧？

我们更不想让红布再来蒙住我们下一代的双眼吧？

五

知青，这个唯中华人民共和国独有的人群，其成员如今多已年过花甲，甚至年近古稀了。“知青”的称呼也只是历史留给这个人群的符号了，它的字面意义已与这个群体的现状无关。但是“知青”、“知青运动”的话题依然特能撩拨老年知青们的心。这一点，这次如梦轩在编撰《流逝的记忆》过程中来稿踊跃的情况就能证明。对知青话题的禁锢和限制，不仅使大是大非没理论明白，就是个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也被郁结多年。揣着一本糊涂账，掂着一段未了情，就这样走到人生尽头，难免让人心有不甘。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还是有知青生活的纪实读物穿越禁与限的围栏面世。我就曾读到过几本同校毕业的知青自发组稿编印的回忆录（非正式出版物）。

蒙如梦轩主杜良怀先生信赖，我有幸提前拜读了《流逝的记忆》编撰期间收到的部分来稿。将这些来稿与以前的有些读本比较，我感到最大的不同就是“无怨无悔”的雄壮旋律减弱了，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抒情也淡化了。相反，神圣光环下的荒诞、冷酷与悲惨被更多地揭示出来。

例如，孔宪明先生的《倒流千里》，单是这极具中国特色的“倒流”二字就揭示了多少令人屈辱的荒唐：被敲锣打鼓送（接）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竟变成了城市的弃儿，再回城，就叫“倒流”了！回城探亲，即使怀揣三级基层政权层层批准的“介绍信”，仍会被城里的“革命群众”视为“倒流人员”，遭到粗暴盘查与驱赶！这样的“待遇”，对于自作多情地陶醉在“接班人”光环中的知青真是残酷的讽刺！

来自烟台知青姜惠珍女士的稿件《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披露了自己当年写的日记。从这些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被革命话语绑架后“自愿”下乡的少女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在白天，在人前（甚至在家人面前），她一开口就是领袖教导加豪言壮语，但在夜晚，在人后，她却被思家之苦折磨得以泪洗面。这种

表里不一是不能简单归罪于少女人格分裂的，它反映出挟强权之威的暴力语言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真水女士的《小方》在和讯博客“海纳百川”上一贴出来就打动了很多老年知青的心。作者以淡淡的语气讲述了一个看似只略带忧伤的故事，却揭开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在大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大背景下，不知有多少所谓“出身不好”的优秀男女青年，无声无息地沉没在“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了！远离现代文明的穷乡僻壤，或许是权贵子弟们镀金的“熔炉”，但对受政治歧视而遭变相流放的青年才俊来说，那儿就是埋葬他们天资才华的坟墓！而且，这一悲剧还具有隐蔽性——摧残尚未绽放的花蕾，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是在摧残一片春天？在 1700 万的巨大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小方的毁灭？谁能说得清其中有多少个未来的大师、巨匠被扼杀于无形之中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喜欢为“知青运动”辩护几句的杜良怀先生却为一群叛逆知青立了一块《路碑》。他笔下那群知青伙伴在文革期间与我一样，也属于“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红卫兵，但被“自愿”下到农村后，却玩世、颓废，并大量阅读“封、资、修文艺作品”，宣示了对被政治权谋欺骗、利用和抛弃的愤怒与反抗，成了所谓“第二类知青”。正是这“第二类知青”的出现，预示了迷狂者的觉醒。

.....

应当说，这些来稿的作者并非都对知青运动持同样评价，但他们都追求叙事的真实性，因而大多能带给人回眸往事的感动。

不过对知青话题的禁与限，总还是妨碍了反思历史的。否则，一定有更多人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个人命运。对历史的大是大非越明白，就越能从个人经历中发掘出令人震撼也令人深思的历史细节来。这一点，是一定的。

2014 年 2 月 22 日初稿

2014 年 2 月 25 日修改

【书海泛舟】

《流逝的记忆》目录

杜良怀 姚荣国 肖伯男 编著

序 当年曾挤在一起的那块山崖-----杜良怀

序 难忘，并非因为美好-----愚乐

第一辑 烟雨征程（1966～1968 届知青的记忆）

- 苍天作证-----丽珠/广州
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秋丽/广州
文革风暴中的五七梦-----王在平/武汉
1968 年，我为什么要带头报名下乡-----柳英发/武汉
我家在农村——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朱德源/武汉
小方-----真水/广西
难忘石板村-----刘春芹/武汉
笔架山下-----李武元/武汉
麦青、麦黄、那时斜阳-----戚伏生/武汉
长铺子抗暴-----龙国武/邵阳
那年那月那条河-----陈文年/武汉
天高皇帝远的乡村-----高志远/武汉
凋落的野菊花——“小芳”的故事-----莫安德/武汉
拽车庙-----冯森/武汉
黄梅纪事-----覃兄/武汉
乡情三题-----张纯模/重庆
随风逝去的岁月-----姚荣国/武汉
倒流千里-----孔宪明/武汉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姜惠珍/烟台
青涩的岁月-----李金山/武汉
路碑-----杜良怀/武汉
烟趣-----童青山/武汉
知青岁月散记-----姜荫之/沈阳
广阔天地里的两年牢-----王永宏/武汉
独读-----零家良/武汉
我为农民创建有线广播站-----吴汉华/武汉
当年只道是寻常-----胡赞美/武汉
一元九角二分钱的故事-----黄介成/武汉
毒鸡风波-----李肇文/武汉
仓屋垆，情未央——漫忆我的知青生涯-----张立涛/武汉
“黄牛造业”-----黄秀子/武汉
竹溪岁月忆短长-----陈曙/武汉

锅巴粥-----范国强/武汉
我的知青生涯-----张军/武汉
夕拾的岁月-----唐作立/武汉
千里放排历险记-----原峰/武汉
一样路程两样情-----陶火清/武汉
那些年的那些事-----周海男/武汉
汉南血防故事-----甄少民/武汉
爱的记忆-----蔡福顺/武汉
知青岁月的点滴记忆-----屈光辉/武汉
“偷菜”的故事-----罗谦恢/武汉
我接受再教育的最初两堂课-----向旺明/武汉
放簰-----姚建国/武汉
过年-----王焰涛/武汉

第二辑 马蹄声碎（1969～1973 届知青的记忆）

穿越厄运之门——历史夹缝中的知青岁月-----彭汉良/武汉
放花无语对斜晖——由尘封日记引发的回忆-----肖伯男/武汉
我的蹉跎岁月-----杨家鸣/遵义
始终不愿记起，却总无法忘记-----彭红霞/武汉
我们曾经那样年轻——小记我短暂的知青岁月-----金莉莉/郑州
山里的日子——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陈泽/武汉

第三辑 魂系天山（支边知青的记忆）

天主的女儿-----马伟/武汉
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崔启建/武汉
进疆的第一个冬天-----孙奇忠/武汉

第四辑 水调声长（1966 年前下乡知青的记忆）

梦的记忆-----杨飞霞/邵阳
走向春天-----欧阳光/邵阳

后记

【书海泛舟】

五七梦引领我走上知青路

(《流逝的记忆》选读)

王在平

作者简介：王在平，男，文革爆发时为武汉红旗中学（即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6届高中生，曾任武汉“钢二司”红十月造反公社负责人，1968年12月自愿放弃因残疾可以留城的条件，到湖北省潜江县渔洋区高湖公社新垸四队当知青，1975年返城。

一

一九六七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我和我的几个同学裹着棉被，坐在一间学生宿舍的床上，热火朝天地讨论起了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的事。我们几人都是武汉红旗中学（即文革前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是学生造反派组织红十月造反公社的头头。其中一人就是后来任钢二司中学部勤务组组长、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的柳英发。三个多月前，我们因为支持北京南下学生炮轰湖北省委，成了遭受打击的“少数派”。文革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后，“少数派”翻了案，成了理直气壮的造反派，并开始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眼看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节节胜利，我们以为，文革搞不了多久就要结束了，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文革之后的打算。高考，已经被我们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给批掉了，“就业”的概念压根还没在我们这些“革命左派”的狂热头脑里萌芽。文革结束后，我们该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我们的下一个革命目标在哪里呢？我们谈到了要带上一批“造反派战友”去深山老林开荒种地，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¹”，走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道路”。

我们越谈越兴奋，越谈越热烈，完全沉浸到了对构想中的乌托邦小社会的憧憬之中，以致忘记了窗外还是一个越来越冷，越来越黑的严冬之夜。

二

庞道铭，武汉邮电学院钢二司总部的头头，口吃，但又是极富魅力的演说

¹ 所谓“五七指示”是指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信中的一段话，其中关于学生的是这样说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家。这个只会讲广味普通话的演说者一开口就妙语连珠，激情四射，而且，他一激动就结巴，越结巴还越激动，仿佛就是靠着不断升温的激情冲破了说话中的每一个障碍似的，最后他总能赢得笑声掌声满堂彩。我每次去钢二司司令部开会，都特别爱听他讲话，心中充满了对这位老大哥的崇敬。

“7·20事件”以后的一天，庞道铭来到了我们红十月总部办公室。这时正是“保守派”土崩瓦解，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日子。突然到来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同时也带来了对于未来的茫然。

面对我们这群“同一战壕”的小兄弟，庞道铭在闲聊几句之后立即进入了正题。

“我已经给曾、刘首长（即当时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写信了，”他说，“请求他们批准我带一帮钢二司的弟兄到中苏边界去扎根安家，一边拓荒种地，一边守卫边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描绘起他的戍边蓝图来。他的话，唤醒了我和我的战友们半年前的憧憬，一个个激动无比。

不知是谁插了一句：“庞司令，要是我们报名，你收不收啊？”

庞道铭大笑：“哈哈，我今天来，就是来做宣传动员的。我的队伍里怎么能没有小二癞子啊！”（注：“7·20”之前，“保守派”蔑称钢二司的成员为“二癞子”。）

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还需要动员吗？于是在场的人纷纷表态，要加入庞的队伍。

庞道铭也激动起来。他说：“我们这些钢二司的弟兄们不仅要在中苏边界筑起一道钢铁长城，而且要打造成一支铁军！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声令下，我们就跨过边界，直捣莫斯科，铲除修正主义的老巢，把五星红旗插到克里姆林宫顶上！”

他的话，让我们热血沸腾。

三

我跟肖立人认识是在1968年。这哥们是自己找到我宿舍来的。

第一次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可能连我们在场的是几个什么人都还没弄清楚，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了他的“五七工程队”。他讲得很投入，很亢奋，话语急促，眼里放着光。不时地，他可能觉得自己有什么口误，会突然停顿下来，冲我们笑一笑，然后又接着往下讲，就像不愿给我们插话机会似的。

其实，他一说“五七工程队”，我就想起了近来满大街贴着的《五七工程队宣言》。这份大字报字数不多，但“五七工程队”几个字却十分抢眼。在看惯了火药味一个更比一个浓的“战斗队”名号之后，突然冒出一个自称“工程队”的

组织，不能不让人耳目一新。当然，也让人们期待更暴烈更刺激的那根神经觉得有点没劲。但大字报上书写的“五七工程队”几个字却没有“工程队”的叫法那么温柔：字大，笔画粗，张牙舞爪霸气十足地高居于大字报顶端，占去了一张大白纸的小半截。不知为什么，我看着眼前这位喧宾夺主的客人，突然冒出了一个猜测：那满大街同一笔迹的“宣言”，不会都是出自这一位之手吧？（遗憾的是，我竟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当面求证一下！）

刚开始，这哥们一上门就反客为主的做派让我们在场的人都有几分愕然，但很快地，这点别扭就被他融化了。人们都被他不可遏止的热情感染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挂着笑，特别是他那抱歉式地一笑，让人感到真诚、亲切，还有几分调皮，等他说完，大伙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跟他攀谈起来。他离开时，我和好几个同学都送他到了宿舍大楼外。在宿舍楼外，他跨上了一辆停放在那儿的自行车。他跨车的样子让我觉得有点异样。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小声问身边的人：“他是不是腿脚有点不方便？”旁边的人说：“是啊，他刚才走路时你没看出来吗？”

我心里升起了一番异样的情感，但说不清是同病相怜，还是惺惺相惜。因为我也腿脚不方便，我也骑自行车。

自那次认识之后，肖立人找我的次数多了起来。我知道了他是武汉市三十三中的高中生，年纪与我相仿。我已不记得他每次来都说些什么了，但有一点我能肯定：在那个派性膨胀的日子里，我们的谈话是“超党派”的。我们的话题似乎从没有涉及过“派性政治”，以致在听说他“自杀”以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肖立人是哪一派的？“钢”派？“新”派？还是“老保”……我发现，尽管交往了一些日子，我都不知道他是哪一派的！想到这一点，我都有点奇怪了。

他跟我谈得最多就是他的“五七工程队”。尽管我觉得他进驻神农架原始森林的想法过于浪漫了点，但我从没有企图去浇他的冷水。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工程队”的会议，我去了。我看到这不过是一支一二十人的小队伍，与我们几百人的“红十月”根本不能比。而且会场也显得没秩序，肖似乎也不善于掌控他的队伍，近两个小时的“会议”始终都在七嘴八舌闹哄哄的状态中，让人有点不得要领。只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些争先恐后的发言者都跟他一样，个个豪情万丈。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肖立人再没来找我了。我也不知他的“五七工程队”还在不在，在做什么。没多久，我也下乡了，我跟他的联系也彻底断掉了。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从农村回到武汉时，我们学校的吴老师告诉我：肖立人自杀了。

我一听，吓了一跳，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问他：“你说的哪个肖立人啊？”

吴老师说：“就是那个老来找你的肖立人啊，三十三中的！”

我看他说得清清楚楚的，不会搞错，只好又问：“他怎么会自杀呢？为什么呀？”我无法想像，一个那么热爱生活，意志坚定，而且总是一脸笑意的人会去自杀！

吴老师的话让我更吃惊了：“听说他跟‘北斗星学会’（注：当时被定为‘反动组织’的一个群众组织）搞到一起去了。他是在‘学习班’里自杀的！”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只是在心里不断地、重复地问自己：他怎么可能自杀？他怎么可能自杀？？我实在无法把那张总是一脸笑意的面孔同“自杀”二字联系起来！

这一疑问，我一直保持到今天！

四

我不知道曾、刘首长是怎样答复庞道铭的，不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倒确实拉开了序幕。这自然让像我这样早已做着“五七”梦的人备受鼓舞，但是，不同的声音也产生了。在红旗中学传达室门口，就发生了一场关于这个运动的辩论。“反方”的中心人物是王新洲。这个小我几岁，但跟我同时造反，一道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少数派”时期，又一道创建了“红十月造反公社”的同校同学，终因观点不同，加上内部的权力之争，与我渐行渐远。我拥有了众多支持者，而他则被边缘化。他的思想在我眼里也变得具有了异端的色彩。

他站在传达室门口，引述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雄辩地说道：“……真正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城市里的大工业生产，真正革命的生产力是大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人阶级，中国农村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民也是一个保守落后的阶级，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让他们在一个落后的生产环境中接受一个落后阶级的影响，有什么革命意义可言？中央的这一举措不过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已，有那么多张嘴等着要吃饭啊……”

他说话时，很容易进入演说状态，竖立着右手食指指指点点，说到激动时，就口角挂白沫，额上暴青筋。

他的话不仅同中央“两报一刊”的宣传大相径庭（“两报一刊”从来只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提都不会提就业压力之类的事），而且把“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说成解决“吃饭”这样庸俗的事，实在有点亵渎我心中的一份神圣感。我跟他争论了起来。但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拿出多少过硬的理论来驳斥他。我只是不断地在提醒他，这是一个要不要走毛主席指出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坚持、捍卫还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问题。

但是我知道，这些说辞一点也没有说服他。我之所以在气势上还占着上风，只是因为四周，我的支持者远远多于他。

王新洲今天在哪儿，我一直没有打听到。

五

除了王新洲，“上山下乡运动”的阻力也让我在做上门动员工作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位同学的老妈干脆把我拦在门外，不让我见这位同学。

“不去，我们家×××（同学名字）不去！”她的回答干脆利落，毫不含糊。

我还试图努力一把，问：“他为什么不去？”

老妈突然爆发了：“他有病！有内病，内病，你懂吗？每天早上起床，裤子上都是一大摊！你要不要我拿给你看？你等着，我去拿给你！”说完，她就做出转身要去拿东西的样子。

那一刻，我多少也有点明白她说的“内病”是啥意思了，但这算啥病？这“病”咋又下不得乡了？但我不敢再问下去了，这毕竟触及在那个年代被视为禁忌、也让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羞于提及的话题。我怕她真去拿出什么东西来摊在我面前，便拉着与我同去的一个同学，调头就走，任由她一个人在我们身后喋喋不休。

这件事真正让我意外的是，这位被动员的同学文革前也是共青团员和学生干部，文革起来后也是造反派，我不懂他怎么突然变“落后”了！我给自己的解释是：革命的大潮必然不断淘汰那些意志薄弱者！

六

尽管原来的党政系统早就瘫痪了，但以军队为骨干的管理组织仍有强大有效的动员力量。连我在内，在学校革委会中任职的学生代表几乎都报名加入了首批下乡的队伍。在我们的带动下，一百多号人的队伍很快聚集到一起了。市里召开了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我和柳英发被请上了台，在他代表全体知青表完决心之后，武汉警备区的方铭司令员上前接过了他那张用大红纸写着的决心书，并与我俩热情握手，连声说：“好！好！好！”

我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左下肢肌肉萎缩无力，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政策规定可以不下乡？坦率地说，我连去询问的念头都没有过。而且我相信，即使有人拿出这样的政策来劝留我，也一定会被我一口回绝。我这一态度就那么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所以直到离开城市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人为此向我张过口，包括我的家里人。

七

但我也不是一个对下乡后会遇到的麻烦毫无预知的人。当得知我们下放的地点是潜江县渔洋区，而且得知这一地区还有不少文革前下放的老知青后，我便以学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已是革委会常委的吴老师一道前去进行了一番考察。

考察中，我俩得到一位姓章的老知青和他的伙伴们的帮助。他们说是“老知青”，但年龄并不比我大，有些甚至还小不少。但他们是文革前就从城里被下放到潜江来了，来的时候大多只有十五、六岁，有的甚至更小。而且他们自嘲着说：我们算什么“知青”？我们中有不少人连初中都没上过，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但因种种原因，成了“社会青年”，结果在街道居委会三天两头“上门动员”的压力下，只好“响应党的号召”，下到农村来了。

他们带着我们看了好几个老知青的安置点。

在一个安置点，我看到了一间你根本不相信里面还住着人的残破房舍。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站在屋外，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望着我们走拢去。章上前跟他搭讪了几句，问他：就你一人在家？还有人呢？男孩回答：谁谁谁回武汉了，谁谁谁出工去了。我们一进门，我就被眼前所见震惊了：堂屋的锅灶落满了尘土，也不见油盐酱醋和干净餐具，完全就不是开过伙的样子。走进侧房更是不堪入目：一排从东墙搭到西墙的大统铺上，一个紧挨一个地胡乱铺放着七八床被子和垫絮。这些被子颜色各异，但同样都污秽不堪。更恐怖的是紧靠统铺的一面墙已经倾斜，只有一根碗口粗的大木柱反向斜撑着它。

章告诉我：这个点上的“知青”，来的时候都只有十三、四岁，根本没生活自理能力。刚来的时候还有个带队干部带着，但一个多月以后，干部回城去了，就留下几个啥也不懂的孩子在这儿鬼混着……

离开了这个安置点，章和他的伙伴们还带着我们跑了几个点，一路上，吃饭在知青点上，晚上睡觉也在知青点上。虽说哪儿都是一副穷相，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这些老知青们对我和吴老师由衷的热情。在两天的行程中，我们听说了不少老知青悲惨的故事，也亲眼目睹了他们贫病交加和毫无希望的生活。他们还跟我们讲起了他们与当地农民的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知青被一群愤怒的农民打死，然后四里八乡的知青全闻讯赶来。主凶一家早吓得全家逃亡，知青要烧他的房子，但在隔壁邻居的苦苦哀求下（理由是大火一起必殃及多家无辜者），被复仇的怒火烧红了眼的知青们总算保留了最后的理智，只是上房顶扒光了所有瓦片，并砸烂了屋里锅碗瓢盆等一切能砸烂的东西……

老知青的悲惨境遇让我十分震撼，也引起我极大的同情，但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让我感觉到了在一个特殊生活环境中孕育出的独特魅力，包括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对某人某事的诅咒，互相间的戏谑和嘲讽，甚至晚上躺在床上说出来的“下流话”等等，都让我隐隐感觉到他们似乎已经成了一群无拘无束的人，有一种像我这样整天生活在“革命组织”中的人从未体验过的快乐。章比我小，我跟他交谈时，竟有一种听一个老成世故的长者讲述往事的感觉。但当他和他的伙伴们说说笑笑地撑着小船，把我们往一个个知青点上带时，我又觉得他们依然散发着来自天性的快乐，用今天的话来说，还是一群阳光大男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那些悲惨故事的讲述者与他们似乎判若两人。

我很想向章证明，我们这些即将下来的知青与他们这些老知青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有毛思想武装，并经过了文革洗礼的。而且，上山下乡是我们自愿的选择。

章只淡淡地回答了我一句：我们刚下来时，也是很有革命热情的。

在我已经接触到的老知青中，我感觉章是最沉稳也最有主意的。不过，章自己告诉我，有干部说：章是老知青中“最坏的”。这话，我后来也听到干部说过。

我们在渔洋考察的时候，恰逢县里正在召开接待、安置知青的动员大会。这是一个由区、公社、大队主要负责人出席的规模庞大的三级干部会议。当老知青正在向我和吴老师倾诉他们的苦难时，聚集在一起的社队干部们也在互相传播着关于老知青的种种劣迹：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辱骂干部，甚至——强奸妇女等等，总之，正如一位大队干部说的：“老百姓一提起知青，就像当年提日本鬼子，又恨又怕！”这些传言无疑引起了许多社队干部的恐惧。有的队干部甚至对上面说：“你看你们准备分配多少知青去我们那里，我们每年把他们吃的米给他们送到武汉去就是了，让他们别下来了。”

县安置办主任老张找到了我。他希望我去作一个大会发言，帮县领导们化解干部们的抵触情绪。

我去了，怀着一种捍卫毛革命路线的使命感登上了县政府大礼堂的主席台。

我不怵在大庭广众下演说，这是两年多的文革锻炼出来的。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来小时。我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经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考验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不同于以往的老知青的。

那是一个火热的革命年代，任何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说总会赢来热烈掌声的。

八

彩旗招展，歌声飞扬。出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68年12月2日，装载着红

旗中学首批下乡知青的卡车在锣鼓声中缓缓驶离校门口。前来送行的老师、同学、家长和被锣鼓声吸引来的附近居民自发形成了夹道的人墙。车上被送的人轮替地唱歌，喊口号，或者大声诵念着毛语录。“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主打歌曲；“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了主打语录。卡车的侧面则挂着“扎根农村一辈子”大标语。

在与家人最后道别的时候，一个女同学终于忍不住了，哭了起来。但她的眼泪似乎并没有引起连锁反应。

从武汉到潜江行驶了四个小时。潜江县组织的欢迎队伍早早地就在县城外等候着了。从县城到公社再到生产队，一路上都有迎接的队伍，除了帮我们搬运行李，他们都还带着锣鼓等打击乐器，热热闹闹的。只不过随着不断分流（各个知青组都分赴不同的生产队），一直陪着我们小组进到高湖公社新垵四队的，也就剩一副小钹和一个小锣了。“台——强！台台强！”这对“锣钹组合”发出的单调声响在空旷的田间小路上已无法营造热烈气氛了。

后来我才知道，村里所有红白喜事全仗着这对“锣钹组合”呢。

我们一组十来个人被带到一座才建好没多久新棉花仓库前。仓库分东西两间，正好一间住男生，一间住女生。不过这时床铺桌椅还没打好，我们暂时还只能在地上铺一层厚厚的新稻草打地铺睡觉。我一边把背包行李扔到散发着草香的地铺上，一边带着几分兴奋又几分茫然的心情默默对自己说道：看来，新的生活将从这从来没有睡过的地铺上开始了！

2014年1月7日初稿

【书海泛舟】

路碑

——一年零八个月的浪漫与终结

（《流逝的记忆》选读）

杜良怀

作者简介：杜良怀，男，生于1948年9月，武汉市第三中学高中六七届毕业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在金融管理部门退休。

半世纪前，从湖北省宜昌市到远安县有条公路，在这条砂石公路上有块标志距离宜昌市16公里的路碑，路碑旁，有座孤零零的土屋，当年我们知青就住在

那儿。

土屋后侧有个溪水迂回形成的深潭，另一侧有片荒坟野冢，周遭数百米范围内只见田亩不见人家。现今公路翻新改道，原来的那段路成了条长街，溪、潭、坟冢、田亩、土屋全消失了。更早消失的是“知青”。

而当年那块粗糙的水泥路碑却一直清晰地树立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分野的一块界碑。

我的知青生涯不长，作为一种生活或生存状态，它始于1968年12月28日，“东方红32号”轮溯长江而上将我抛到宜昌。一年零八个月后，另一条船，“武汉轮渡九号”将我和300多名知青顺流而下带回了武汉，这300名知青成了武汉市交通邮政管理局属下各单位的新工人。

那年“东方红32号”轮装载了上千名武汉市的中学生，在惊天动地的哭喊中启航，经新堤、监利、沙市、枝城、宜都直至终点宜昌，沿途丢下了一批批脸上混杂着茫然、困惑和希冀的年青人，在船上还是学生，当他们踏上陆地时就有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没出现过，以后也不容易再出现的共同名称：知青。

鄢二队

路碑边的小土屋里住了4个男知青，我、周福生、莫安德、祝菊生。

这个组合的形成没有认真策划商讨的过程，随便得有如现今约伴旅游。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发表，虽然零零散散下了两第三批学生，可都不成规模，我在观望，能不去就不去，去也无所谓。我13岁离开父母，在学校住读，独立生活到20岁，下乡无非换一个环境。那条毛泽东著名的指示一公布，大势所趋，才想到要结伴。武汉市老三届下乡有两条路，一是按校划分省内对口县乡，学生自由结合成小组，分到生产小队，武汉三中对口的是宜昌县。二是可以单独投亲靠友，去亲友所在或某个愿意接纳的农村生产队。周福生和莫安德同班，我和他们同校同年级，但不同班，同班关系好的同学或者已经下去了，或者选择了投亲靠友，找不着愿意去宜昌的。一次和周福生下围棋，随意问了句能不能跟他一块去宜昌，他边下棋边说了个行字，这就定下了，随后报名，下户口。

武汉三中校园文革时有个规模很大，包容了从初一到高三所有班级的学生文革组织“红岩战斗队”，谢保安和周福生是这个“战斗队”的领头人物，我和莫安德、祝菊生属于紧密跟随者，在踏上“东方红32号”轮之前，我和莫安德很少交往，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周福生。

我们这个知青组合促成得很偶然，但偶然中却有着共同的文革经历和对世界、人生的认知基本相同的必然。我们从离开校园第一次真正进入社会时走到了

一起，从此几十年不离不舍，我和莫安德成了至今不渝的知己，死在宜昌农村的周福生，也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脑海。

当年的农村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三级行政，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村、组。这批武汉三中下乡知青被分配到宜昌县小溪塔区张家场公社的各生产队，我们分到鄢二队，它的全称是鄢家河大队第二生产小队。鄢家河大队是宜昌县内相对富裕的地带，宜昌地区在这里搞“大队经济核算”的试点，军分区常年派员蹲点支农，公社机构设在这个大队的地盘上。宜昌市至远安县的公路穿队而过，以这条公路为轴，两侧远处有连绵起伏的山岭，在山与公路之间小丘陵地带散布着10个生产小队，其中从鄢一至鄢八，8个小队分有知青。我记忆中鄢六队条件最好，公社、供销社、轧米厂等在地界内，工分值最高，有电灯，五队也不错，用的也是电灯，这为以后谢保安、童青山分到鄢五队后索要安家费买电子管收音机提供了条件。

我们鄢二队条件中等，几十户人家，分散在公路两侧稍平坦处，小队长分配生产任务要站在高地上扯开嗓门喊叫。队里的田地每年种一季小麦两季水稻，下乡那年，工分值0.46元，这在宜昌地区算中等偏上，听说山里的工分值有低到0.08元，8分钱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强劳力干一天可以评、记1个或1个以上的工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我们评的是0.7个工分，按妇女劳力的标准评出来的。

老三届下乡时，国家有政策性照顾，每人120元安家费，半年内由国家提供每人每月45斤大米、半斤食油，安家费给生产队为知青建房，添置必需的生活物件。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民省下了这笔钱，把空余的旧房给知青居住，他们认为知青迟早会离开，建房多余。给我们住的就是那16公里路碑旁的土屋。

土屋原是队里的仓库，为了让我们能居住，进行了些改建，隔出了一间堂屋和两间十平米左右的小房，砌了炊台，放了个大铁锅，装了烤火（宜昌人称为向火）的砖砌火塘。我们住进去的时候仓库里存放的东西没有搬空，梁上挂着架大水车，墙角堆放着十几个油篓，装的是以后要分给农户的食用油，屋外有个高高的属于小队所有的柴火垛。他们很放心把这些留在我们的辖区内，后悔是注定了的事。

第二类知青

知青的名称是共同的，知青生活与生存状态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多种多样，莫安德把在农村的知青大体归纳为三类：一是老老实实，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类；二是不思改变，和上山下乡的宗旨背道而驰类；三为介于二者之间类。莫

安德在回忆中写道：“十分不幸的是，我们鄢二队的周福生、杜良怀及我与鄢五队的谢保安、童青山，就属于第二种人。我们出勤率很低，在屋里生龙活虎，在田里无精打采。队里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我们从不施肥浇水，菜籽撒下之后，采取无为之治，任其自生自灭，田里的草长得比菜高。”

据我的接触和了解，一、三类知青在知青群体中占绝大多数，起码在老三届知青中完全属于第二类的很少，而我们鄢二队和鄢五队的组合可以称为第二类知青中的典型。因为稀少，所以我想如实回忆和记录那段青春浪漫的生活和它的终结，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周福生死去之前我没有体会到“不幸”，我一直觉得那是段“快乐的生活”，在我曾写过的《棋缘》、《烟趣补》、《我的所爱在山腰》中涉及到农村知青生活时浪漫的欢快是主旋律。同学王焰涛注解为“法国的书，俄罗斯的歌，天上的星星稻草垛。”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那一年半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自由最无顾忌最清纯的时段。

当年鄢家河丘陵起伏，阡陌纵横，晨昏时分，坐在屋后的田埂上，炊烟袅袅，远山朦胧，像在读一首秀美的田园诗。如果不考虑吃穿用这些最必需的生存需求，就可以去感受这大城市绝没有的风景。我们没有担忧过吃。前半年有国家保障的粮食供给，后来按工分分口粮，农民强劳力的粮食都不够吃，要“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要辅以“杂粮、瓜菜代”，我们记的工分少得可怜，分的粮食不到月半就吃光，没粮就找队长要，名为借，实际上从来没还过，也没想过还，下乡期间所借总数应该超过两千斤米（不是谷，当时100斤谷可轧70多斤米）。生产队记着账，我招工回城，走向生产大队写过欠680斤米的字据，这应是鄢二队知青借粮总数除以4后的数字。

口粮分得少，一是评的分低，有技术含量的农活我们不会干，跟着妇女们（乡下统称为妇联）做些随大流的简单活，如几十号人一字排开地锄草。二是出的工少，用莫安德的话说“出勤率很低”，很低到1969年全年我做的工分不到400分，而当地农民劳力大多超过2000分。

我们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睡够懒觉后或看书或下棋或写信或品书议事，纵论国事，畅想爱情，此外就“走乡串队”——到几里外几十里外的知青同学那里吃饭聊天。

我和周、莫性格各异但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我们都爱看书，各自带了不少的书下乡，多为中外名著，议论书中的内容是永不枯竭的话题。记得议论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伏尼契的《牛虻》、中国郭沫若和创造社、新月派的作品，等等。还与晚我们半年下乡的谢保安议论过他推崇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著

作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我和莫安德谈得最多的是《红楼梦》，谈书中的情节、诗词、人物，大观园女孩中我们共同欣赏晴雯，喜爱的是史湘云。他还读《楚辞》，可以背出全篇《离骚》。这段时间的读书、论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可以说我“生活在书中”，以书中我认为的“美好”去寻找、定位我的理想、追求，包括爱情。

下围棋消遣了我们在农村的大段时光。对于学生而言，文革在 1968 年中期就已经结束，尤其工宣队进校后更无革命可闹，我们所谓“谢派”的学生中不少人爱上了下围棋，还举行过比赛，这个爱好带到了农村，我和周、莫兴趣一来就下个没完，和周福生下的最多，还常下赌棋，输了的买鸡大家吃。尽管我们在生产队没挣到过钱，还欠队里的账，好在那时鸡价很低，用家里寄来的钱，花上大几毛钱就能找队里的农民买一只肥鸡。童青山随谢保安下到鄢家河后，下围棋进入高潮，搞过几次规矩严明的比赛，生产队长派活要我们出工，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围棋比赛为由说不。在农村我的围棋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以后在工作单位和系统拿比赛冠军打下了基础，围棋成了我终生不弃的爱好。

我们的这间土屋可能是宜昌地区接待来访知青最多，知青聚会最频繁的地方，这得益于地利与人和。紧挨着直通宜昌市的公路，方便寻找，哪怕仅仅是路过也会进来歇脚，周边无农户，不会受干扰也不至于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节奏。下乡前因文革我们已经形成了个亲密的团体，聚会的习惯延续到农村，周福生是校园文革中的领袖级人物，知名度高，认识的同学多，人缘好，连远在枝江县、当阳县的外校知青也曾慕名找来。到谢保安、童青山下到鄢家河五队后，聚会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谢保安低我们一届，却是三中文革中某一派的一号人物，这一派曾被称为“谢派”，他在当年武汉市参与文革的中学生中享有响亮的名头，因被进入学校的工宣队审查，比我们晚了半年才脱身下乡，听到消息，有几十位同学从各生产队赶到宜昌去接他。他们下的鄢五队距离鄢二队 1 公里多，他们常来，我们常去，几乎像在同一个生产队，聚会大半在我们鄢二队，同学聚集之多，有时到了要用水桶装稀饭吃的程度。童青山带了部手风琴下乡，他拉琴，大家高歌，《三套车》、《红莓花儿开》、《深深的海洋》、《卡秋莎》，一首接着一首，热烈的气氛达到极至，有同学将文革“红岩战斗队”的大旗插到柴火垛上，红旗在晚风中飘扬。后来传来消息，说县里为此还紧张了一阵子，怕知青要闹什么大乱子。

童青山说过“鄢五队出思想”，指的是谢保安热衷于政治，对国家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常有敏锐、深刻、独到的见解，他能导向我们这帮同学的思想。他和童青山在我们的助威下逼着大队长拿出安家费中的 80 元钱买了台当时非常高档的红灯牌收音机，能收听到许多与官方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声音，我们的视野能跳出闭塞的鄢家河。从骨子里我们都属于理想主义者，是带着崇高理想读书、参与文革的，这个“崇高理想”的内容组成很杂，几乎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古今中外历

史文化中一切能打动我们、激动我们的各种成分，斯巴达克斯、美国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意大利“烧炭党人”、俄罗斯“十二月党人”、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周福生下乡后开始写长篇小说，男主角以谢保安为原型，名字叫马仑，意为马克思加拿破仑。

我们积极参与了文革，可当了知青，就出现了排斥文革的逆反，我们认为仍在进行中的文革抛弃了我们，我们说过不少在当时能被认定为反革命的言论。但也正是我们所参与的文革给了我们自信，真的以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天下为己任，岂能拿一辈子锄头？这种校园内的自信使我们在第一次真正进入现实社会时，从理想主义中变异出了不合时宜、不顾环境的浪漫生活。

在落后的农村，贫下中农不可能教育我们，也没见谁来教育过我们，我们曾试过去主动受教育，下乡没几天，我、周福生、莫安德去小队“贫协”主席家，请他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贫协”全称为贫下中农协会，在生产队里和队长、会计、民兵排长、妇联主任一样算领导班子的成员，不脱产，有不同的工分补贴。鄢二队的贫协主席姓鄢，七十多岁了，人称鄢老头，他当过兵，先是国民党的兵，当了俘虏后成了解放军，退伍回乡，孤零零地没亲人，在鄢二队他是唯一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挺自豪地给我们讲他见过的世面，回忆他最苦的日子，听着听着，我们觉得不对，问他这是哪一年的事？原来他讲的是六十年代“三年灾害”时期。

在农村的日子里我们都勤于写信，我的通信无非两类，给父母给同学友人，给父母报平安，写的全是让他们放心的话，给同学则直抒胸臆。有一次，不知怎么出了错，给同学的信落在了公社秘书手里，他把我叫到公社谈了次话，批评我信中流露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挺宽厚，没上纲上线为抗拒接受再教育，我和他争辩，举出农民种种落后表现，他不反驳，引了句毛主席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让我刮目相看。他把信还给了我，平和分手，以后没被追究。

我们不想变成“广阔天地”里的农民，看不出在农村会“大有作为”，从头到尾就没打算在农村扎根，鄢家河仅仅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所以我们成为了第二类知青。

周福生之死

鄢二队，大队、公社对待我们可谓无可挑剔。前半年有专门安排的“生活辅导员”教我们做饭、帮我们种菜，辅导员卸任，我们任由自留地的菜自生自灭，为了解决知青的吃菜问题，队里允许我们随便拿属于集体所有的用来喂猪的南

瓜。农民要到很远的山上打柴家用，我们不去打柴，允许我们动用生产队的柴禾。任由我们出不出工，没粮了可以借，借了不还还可以再借。我们偷过几次菜，我们能用轧米时分离出来的糠和农民换菜吃，偷菜的次数不多，而且不吃窝边草，只偷外队农民的菜。我们没偷过鸡，偷鸡需要技术，但我们吃过很多次邻队知青偷的鸡。我们偷过菜油，从生产队存在我们土屋中的油篓中，每个油篓中倒出一些油，同时加进相同份量的水。油按月份分给农户，次数多了自然会被发现，可队里只是把剩下的油篓搬走，没有追问。挂在土屋梁上的那条长长的水车被我们一点点的当柴禾烧光了，鄢家河水利设施齐全，队里有抽水机，可以不用水车，烧了更没人吭声。

至今我还在思索，为什么鄢家河的农民能够宽容我们“浪漫”的行径甚至是劣行？

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武汉下宜昌的老三届知青普遍强势，没听说过有被当地农民欺负的事，和各顾各的农民相比，同一所学校来的知青共同面对陌生环境则更像一个心齐的集体，当地人反居于弱势。

当年的宜昌地方政府深知“运动”的厉害，他们怕担负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责，武汉知青船到宜昌市就和当地年青人打了场几百人参加的大群架，据说后来被抓的是当地的一名老者，罪名是唆使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这个大背景，宜昌的农民又格外淳朴、勤劳、善良，他们中有一辈子连宜昌市都没去过的，只知道武汉是个大码头，他们没人相信知青会长期呆在他们那里不走，迟早要回城，因而同情和怜悯来受苦的知青。同时也怕敢打，常把“烧房子”之类的狠话挂在口边的知青，其实在宜昌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知青烧过谁的房子，但宜昌农民仍然对知青表现了他们最大的忍让。

各级组织和农民没有逼迫，我们自己做出了改变。我在农村的浪漫生活终结于周福生的死，而在他死之前我们已经感受到持续了一年多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几个20岁左右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在完全陌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环境里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只是在一段时间内，精神取代了物质，快乐掩盖了困苦。但理想毕竟不能当饭吃，困苦越来越像魔鬼一样不可战胜。什么时候能离开农村还不见影子，我们感觉到了生存上的危机和对前途的迷惑。

我们开始嘲讽屡见不鲜的大批同学来了、吃了、乐了、走了的场景，记得莫安德引用普希金的诗调侃“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从此飞走无音信。”于是我们宣布要进行“新生活运动”：多出工，少聚会，节省粮食，料理菜地。这仅是无奈之举，说的响亮，能做到的少。当时农村经常要修水利搞工程，这是个出些苦力就不愁没饭吃的出路，我们要求参加，队里求之不得，从1969年冬到1970年春，我们大多呆在建设工地上。

在对待农村、农民的态度上鄢二队知青群体产生了分化，我和莫安德仍持对农村现状不屑一顾，混一天算两个半天的态度。祝菊生以他能唱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特长厮混在大队、公社级别的宣传队。周福生真正转变了态度。他认真读毛著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加入学毛著小组，向农民宣讲心得体会。他剃了个光头，以示与过去告别，做农活休息时，他一反过去我们单独聊天的习惯，和农民一块嬉闹，男女照例要动手动脚，他也跟着笑，锄草时农民唱《十八摸》之类的荤歌，以解单调、枯燥，他能跟着唱，他要彻底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回土屋后我和莫安德毫不掩饰对他的挖苦，嘲笑，认定他的做法无意义无价值。可这动摇不了他的决心。

在学校文革学生组织的两个首脑中，和谢保安容易激烈、冲动不同，周福生宽厚、儒雅，长得英俊，体格健壮，风度翩翩，文革前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文革中他从未以任何方式伤害过任何一个老师或同学。他随和但认准了的事就非常执着，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执着。

1970年6月初，传来要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这无疑是福音。不幸的是我们的粮食又吃完了，按惯例找队里去借，可队长说收割的庄稼因连续降雨而不能打场脱粒，仓库里无粮，只剩下些当饲料的木丸子（豌豆）给了我们。吃了两天豌豆，实在吃不下了，就找大队借粮，大队长以同样的理由说没粮食给我们，他建议说：那么多知青来你们这里吃饭，我批准放你们三天假，你们到别的知青那里去吃住三天，只要天晴能打场就给你们粮食。在以后追究周福生死因时，我们搬出了他的话，他可以否认但没有否认，这让我们不至于背上“无政府主义”的责任，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也可见宜昌农民、基层干部的淳朴厚道。

6月6日上午公社召开知青大会，传达有关招工的文件精神，下午谢保安、童青山、周福生去小溪塔公社蔡家河四队吃住，蔡家河有陈文年、张显刚、王诗平、胡启志四个知青，他们和谢、童是同班同学。我和莫安德没和他们一块走，当时下着雨，打算等第二天晴了再走。夜里，大队长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他的话更惊人，他说接到区里打来的紧急电话，周福生被河水冲走了，生死不明。我知道周福生水性极佳，渡长江玩儿似的，我多次去过蔡家河四队，都是踩着河中的鹅卵石走过去的，周福生哪会在这条河中出事？第二天清晨为了寻找周福生的去向我游过了这条河，只见暴雨形成的山洪在溢满的河床里奔腾咆哮，满以为踩着石头不用湿鞋就能走过的溪沟突然变成了宽愈百米的大川，我在河水中真切感到了死亡的恐惧，这时雨已经停了很久，山洪的势头回落，头天周福生他们下水凶险肯定更大。在蔡家河四队的知青屋里没看到周福生，我开始为他的生死担忧。

三天后周福生的尸体被发现在下游8里处的一个池塘中，额头有明显的撞

伤。谢保安、童青山游过去了，周福生泅渡中头撞上了鹅卵石，昏迷后淹没冲走。那一瞬，谢保安记得是 1970 年 6 月 6 日下午 5 点左右。

周福生死了，定格 22 岁。不论从那方面看，周福生都是我们鄢二队知青中最优秀者，人生前景无比光明，可偏偏是他死在山洪狂泻的河水中，仅仅是为了吃上几顿饭而游水渡河！死因简单但荒谬。在乡下我们曾谈到普希金《我的墓志铭》，兴之所致，每个人都依原诗样式胡编自己的墓志铭，记得我编的是“这里埋葬着杜良怀，他已抽完了 20 公里的香烟”，周福生当时怎么编的已没记忆，可他决没预想到他将死在他“走”过多次的蔡家河水里。

很多知道周福生的学友、朋友感到奇怪，面对这么狂暴的山洪，他们为什么还要下水？我觉得答案很明了，从鄢二队到蔡家河边要走 20 里路，翻两座山，走了几个小时山路，饥肠辘辘，下水，河对面的黄土坡上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吃，不下水，只能原路摸黑返回，再走几个小时，可是没有饭菜，没有粮食。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奔腾的河水不过是又一个刺激性的挑战，不下水才奇怪。

周福生的亲属，两个哥哥来到宜昌县，分管的刘副县长接待陪同。周福生是宜昌地区第一个死在农村的知青，县政府答应了亲属的全部要求，周福生本已棺殓，埋葬在鄢家河的高坡上，又依亲属的愿望，开坟、起棺、火化，骨灰安葬在汉阳扁担山墓园。

周福生的死标志了鄢二、五队知青紧密群体的瓦解和农村浪漫生活的终结。没有了聚会，没有了棋赛，没有了高谈阔论，都在默默等待幸运的降临，招工回城。周福生的死对我精神上的打击格外沉重，从进入那间土屋起我们就同住一间小房，细算起来，朝夕共处了 1 年 6 个月加 9 天。我不断思索为什么他会死？除开偶然因素，能看得清的是我们对农村环境过于轻蔑，我们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结出了不可挽回的恶果，他走了，留下的我们必须“涅槃”。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切都已去了，一切都要去了，一切的一，新生，一的一切，新生”，这是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

很多年后，我在给好友的信中写到我们的知青年代，我说：“以最不现实的态度对待最现实的农村生活，悲剧的发生无可挽回。但用同伴只活了 22 年的生命粉碎幻想这也太残酷了。这以后我逐渐开始用现实的态度面对现实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运动’确实不失为很有必要的教育。”

周福生死去的第二个月大招工开始，第三个月中我被招工回到武汉，不久莫安德、童青山进了工厂，祝菊生走得比较晚，最坎坷的是谢保安，在农村呆了 7 年。

不会消失的路碑

1985年，我完成学业前参加实习路过宜昌。我去了鄢二队，那个时候土屋还存在，被不认识的人住着，溪水和深潭也还在，荒坟被铲平建上了房屋，公路还在，路碑还在，我伫足碑前，回忆当年，回想周福生和他的死，我想对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一年零八个月并非虚度，我们读过的书，我们议论并形成的思想将伴随终身，我们还是理想主义者，仍然在关心中国的命运走向，仍然在追寻美好的事物，只有你的死亡是真正的悲剧，它的发生有它自在的必然性，死你而不是死我则是命运中的一种偶然，你的死逼迫我们走上了相对现实的路，你和这块路碑一样是我人生道路上告别青春浪漫的里程碑，永不消失。

2014-2

【生逢乱世】

青春岁月里的荒谬与真诚 ——知青生活的回忆与反思

杜显怡

按：现在提到知青，一般都会将他们视为同一类人。其实，当年上山下乡的千百万知青中，有各不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类型，其中，像本文作者和她的同学这一“群”，就可以算是“知青中的红卫兵”——尽管已经一无所有，但他们仍然沉迷于“造反有理”、“继续革命”的红色梦幻中。

作者简介：杜显怡，女，生于1951年5月。1964年进入重庆一中初67级3班读书。1969年2月随学校到四川省开县铁桥区金沙公社龙桥大队插队落户。1971年1月被招工到重庆沙坪坝区新桥铁作社当工人。1978年考进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后在重庆通用机械工业公司、重庆市委党校工作。已退休。

首批下乡的这一群

1968年底，当毛泽东主席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传来时，对于我们这些处在文革造反运动后期、“造反精神”还十分膨胀的红卫兵，无异于当头一棒。

一开始我不理解、不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红卫兵，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凭什么要下乡，要接受这般发配？我羡慕有的男同学能去当兵，我也想当兵，可是我没有机会。而当年的

小说《边疆晓歌》、电影《年青的一代》等的宣传又把边疆和农村作了虚幻的美化，似乎那些地方都是实现理想的乐土。文革中的“战斗历程”，又使我们形成了“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不可动摇的思维定势。从困惑、不解到坚决响应号召，我只经历了一个极短的思想斗争过程。1969年1月2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反复的斗私批修，我终于选定了上山下乡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到农村去，绝不是仅仅为了挣几个工分，而是去干革命，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而道远。（楷体字摘自我的知青日记。下同）

作为当年重庆一中校革委会最年轻的成员，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带头报名去开县。在全校欢送大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慷慨激昂发了言。

2月9号凌晨，怀着几分豪情几分悲壮，我和首批去开县的几百名同学搭乘东方红某号轮船离开家乡重庆。

我校首批去开县的同学，不少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重庆两派的积极分子。下到铁桥区的我校两派头头就有周新平、屈庆禄、杨定义、肖峰、何开祥、杨子忠、范福琪、黄北极和我，以及我校“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时的主力部队“满江红”的主要成员。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崭露头角的红卫兵们，激情张扬，造反劲和派性十足，并不因为被发配就有所收敛和改变。一颗颗热情而迷茫的心，还在继续关心着毛主席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进程。

下乡第一天的集体“造反”

隆冬时节的1969年2月10日傍晚，我们几百号人迷茫地走上万县码头。一整天的五等船舱和低劣的饭菜，早已使同学们精疲力尽。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专区招待所时，看见进门上方赫然挂着一幅触目的标语：“山城‘八一五’滚出万县！”（当时在万县地区占优势的是与重庆反到底派同观点的“赤旗派”“主力军”）这幅标语立刻把我们经过文革练就的高度政治敏感和派性调动起来了，顿时感到形势严峻。几个“八一五”派的勤务员马上开了碰头会，由我执笔给驻校军代表和工宣队负责人曹德顺写了一封信，说了我们的担忧，请他们关注我们的情况。

第二天清晨，十几辆满载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缓缓向开县进发。翻过险峻的万县大垭口进入铁桥区后，有几辆车的知青在区政府附近下了车，更多的车则继

续前行。土路渐渐狭窄起来，卡车穿行在山的夹缝中，两旁高耸的山迎着车头，越来越密集地向我们倾斜下来。

卡车继续一个劲儿朝前开，山越来越高。好几次，大卡车行至拐弯处，像是到了道路尽头，人人心中都升起了不祥之感。

薄暮时分，大卡车嘎然停在了一个院子里。环顾下车的同学，几乎都是八一五派的。反到底派的去哪儿了？若干年后才知道，当天他们并没有和我们一起离开，而是在专区多停留了一晚。后来把他们分配到了铁桥区政府附近条件普遍较好的公社。在当时那种派性情绪严重的形势下，这是很自然的事。

顾不上吃饭和住下，我们四处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一个社员说，这里是中兴公社，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了，这里是山区，土质薄，只出产包谷、红苕和洋芋。

为什么把我们安排在这里？另一派的都去哪儿了？受骗了！被派性黑整了！

手中端着粗糙的饭菜，肚子饿得咕咕叫，多数同学从前天出来到这时，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可心中像江海翻腾，怎么也吞不下。

我和杨子忠、范福琪、黄北极等几个原战斗团勤务员聚在一起商议，形成共识：决不能任人宰割，我们要逃出去，到铁桥区附近的公社去！于是约定：逃走的行动要快要秘密，就在今天深夜，不能打草惊蛇。

离开重庆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颠簸，同学们枕着谷草，歪七倒八横卧在公社厢房楼的地板上。几个年龄较小的想家想妈妈，嚤嚤低泣。“串联”秘密紧张地进行。我们分头推醒酣睡的同学，悄悄口授行动计划，相约夜里12点统一行动。

四周死一般沉寂，远处传来狗吠。即将有这么大的行动，哪里还睡得着！我和几个决策的同学睁着眼睛躺在谷草堆上，焦急地等候午夜来临。

初二级的何才坤同学带了一个闹钟，他把闹铃调到了深夜12点，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焦急地看着分针、数着秒针。

“到点了！”他一声轻唤，是谁早奔到门口，把木门闩拨开，同学们三三两两蹑手蹑足，扛着行李提着包，鱼贯而出。“咚！”谁的行李碰到了地面，人人惊出一身冷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全体出门后，又留下两个男生断后，密切注意有无追兵。

从中兴公社到金沙公社、民主公社这几十里路，是我踏上社会后的第一段人生路程，走得何等艰难。

我和干部家庭出身的女生胡丽娟背着背包提着箱子，开始时还能跟上疾速前进的人群，可走了还不到一里，就四肢无力、头晕眼花，迈不开步子了。

漆黑的夜，道路没有尽头。我俩没有手电筒，连对方的脸也看不清。黑影幢幢的树林沿着公路排开，铺天盖地般向我们倒下来，心里怕极了，只能坚持朝前走。

正在孤苦无助之际，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声：“喂！那边是哪个？”

“张昭文！”我俩齐声呼喊，像遇到了救星。这位比我们年长一岁的男同学身高 1.78 米，健壮魁伟，腰板笔挺，有着运动员的体魄。他支着电筒，拎着提包大步赶过来。

以后这几十里路，全靠他了。我们两个女孩子只拎得动一个小包。张昭文两手各提一个包，背上还背一个，但我们三人的东西还是一次拿不完。他让我和小胡一前一后守着行李，他把包拿到前面放下，又返回来拿第二趟，实际上他走了两倍的路程。我和小胡眼含热泪，十分感动。这个时刻，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阿喀琉斯啊！以后的岁月里，张昭文成了铁桥区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农民中间盛传着他和同生产队另一男生刘钰力大无穷、双手举起磨盘等佳话。

我们三人跟大队伍的联系断了，唯有一条小河在身边浅吟低唱，像母亲温柔的话语。太累了！太困了！我们把行李放到路旁，蹲到河边，用冰冷刺骨的水揉揉眼擦擦脸，又硬撑着上路。

忽然，小胡发现裤袋里还有两颗巧克力糖，她如获至宝，把一颗给了张昭文，另一颗我俩分着吃了。我从来不喜欢巧克力，这次吃着竟觉香甜无比。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甜的巧克力糖。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八一五’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我们边走边唱，心中坚信，毛主席会知道我们的困难的，会派人来解决问题的。

黄北极、范福琪等几个男生走得较快，天麻麻亮时，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农民，问这是什么地方。农民告诉他们，这里是金沙公社，过小石桥走田坎就是公社的办公地儿。他们匆匆忙忙过了小石桥，走了不到两里路就看到了一些土墙房屋，这里就是金沙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公社的干部还没有起床，看到知识青年到来，感到很意外。喊他们吃了蒸的罐罐饭，就着一点咸菜。

到了公社后，黄北极他们又返回公路上接后来的同学。天大亮时，多数同学都在金沙公社的院坝会合了，一阵阵热烈欢呼、相互拥抱，仿佛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

白平凡、何才坤等同学向周围的社员打听各公社的情况。有社员说，民主公社好，粮食收成多些。当即白平凡同学就提出到民主公社去。他们一行又走了 20 来里路才到达民主公社，早已人困马乏了。公社革委会领导说没有接到安置通知，不能安排他们，暂时让他们在公社院子里住下。

我们的造反行动，惊动了各级组织，也惊动了重庆沙坪坝区知青安置办公室。

第三天上午，金沙河对岸公路上，一辆银灰色伏尔加轿车疾驶而来。熟悉车号的同学说，那是万县军分区的车子。车停在了河对岸，随即下来了三个人，定

睛一看，是驻重庆一中军代表曹德顺政委和校革委委员陈作安、王炳贵同学。他们是接到我们的信，赶来解决这批人的安置的。还没等他们走过小桥，等候的知青们就欢呼起来，女孩子们个个热泪滚滚，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经曹政委他们和区领导商量，同意把到达金沙公社的知识青年分别安排在金沙公社。

到民主公社的同学已经在公社院子里住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有落实安置。如此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何开祥等同学放出话来：如果再不安置，我们就扔下被盖卷，回重庆去了！此言一出，公社革委会领导很是紧张。

曹政委他们到铁桥区的那天，白平凡、何才坤、孙云仲、刘常义等男生正去铁桥区找带队工宣队领导吴子钊解决安置问题，一听说重庆派人来了，受尽委屈和折腾的同学们全痛哭失声。悲愤交加的他们一拥而上，连推带拽把吴子钊打了。曹德顺等领导同时带来了沙坪坝区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意见：就地安置知识青年。经与区革委会协商，也同意把从中兴公社“逃亡”下来的这部分同学安置在民主公社。在1969年春节除夕的头一天，同学们都被安排到了生产队，总算安定了下来。

若干年后回想当年往事，大家觉得不该打吴子钊队长，好在当时只是情绪激动，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打伤他。

我们的造反有了结果，但留在中兴公社的部分同学可苦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茫然四顾，傻眼了，一起来的同学都去哪儿了？我们逃离时太匆忙，人又住得分散，来不及把所有的同学都叫上，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心中很愧疚。尽管留下来的同学后来得到了当地的善待。

“飞车”闯开县

1969年早春，初到乡下的我们，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对参加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兴趣。于是，在下乡第一天的集体“造反”之后，又上演了“飞车闯开县”的一幕闹剧。

这天一早，我和黄北极、刘常义等5个男生相约来到铁桥镇车站，想搭车去县城。从铁桥镇到县城的车每天只有一班，车站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前，却被告之：票没有了！穿着蓝布制服的售票员斜着眼睛不屑一顾，“嘭”一声把窗户关上了。背着背篓的姑娘、提扁担的小伙，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吵吵嚷嚷，叽叽喳喳，想不出法子。

我们几个一合计，便直奔客车找司机。那些年，驾驶员真像握着尚方宝剑，连县长也要让他们几分。我们是铁桥区首批知青，彼此还不知底细，这司机开初

倒还客气。

刘常义递过去一支烟，“啪”打燃火，一个谄笑，双手递上：“师傅，你请！”

司机接过烟，问：“么子事？”

黄北极迎上去说：“我们几个知青想去开县，专门给队里请了假，票却没有。师傅，麻烦您行个方便，加几个座位，钱该多少我们给多少。”都眼巴巴地等着他答复。那唯一的一辆客车，座位刚满，过道上全空着，站十几个人没问题。

“不行！没卖过站票。”司机一句话，把门关死了。后来才知道，铁桥镇到县城不足百里，一马平川，车程就一个来小时。

几个男知青都是有名的“油子”，全没把驾驶员这句话当回事，又一个劲儿地好说歹说，恳请帮忙，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陆续上车的乘客，见我们可怜巴巴的，也在一旁打帮腔，劝司机带上知青。司机被说得冒火了，大概也想在众人面前抖抖威风吧，猛地站起身，一步跨出驾驶室，“啪！”把门关上——他不开车了！

你不开，我们也不下，看你搞个啥名堂。我们索性呆在车上。乘客们见状，纷纷出来调解。一个30多岁的男子自告奋勇当外交使节，劝说司机去了。两三分钟后他带回口信说，司机要我们几个人下去才开车。

要我们下？想得美！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车上有两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急于到县城搭乘当天仅有的一班车去万县。延误了时间，赶不上当天的车就不能按时返回部队。他们心急如火，对驾驶员也愤愤然。

等了几分钟，又过了十来分钟，最有耐心的人也按捺不住了。“你不开我们开，我们知青也会开车！”几个男生嚷嚷道。

司机的执拗也激怒了全体乘客。“知青开！知青开！”全车人齐声吆喝起来。在大家的支持下，刘常义坐到了驾驶位子上。“嗨，我们有自己的司机了！”全车人齐声欢呼。刘常义是我校“满江红”的成员，中等个头，目光坚毅，勇敢顽强，在武斗期间无师自通学会开车，虽没有驾车执照，却是我们“815”战斗团公认的驾驶员。

几个嘴快的知青又在一旁提虚劲儿：“经过训练的，有执照，错不了！”“哼！别说你这车，上海、伏尔加、解放、泰托拉，哪样没碰过！”

“不要你龟孙子，车照样到开县。”一个农民也愤愤地骂道。

话虽如此说，也憋足了劲，但我们心里到底不踏实。几个细心点的男生，都站在驾驶座旁充当副手。

“嗨！我们还有几个副司机。”谁一声吆喝，车上欢声四起。

汽车驶离车站向县城进发，开车的刘常义双手紧紧把住方向盘，身板挺得笔

直，目光炯炯盯着前方，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气。紧挨着他的两位“副司机”不停地为他指点：“左——向左；右——朝右……”与其说是为刘常义鼓劲，不如说是为增强全车人的信心。

我挨着一位农民大娘坐，和他们一样，为我们知青自己开车而自豪。我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路面，一面担心着万一车开翻了会怎样，一面回味着那个司机看着汽车在众人的吆喝声中被开走的狼狈相，心中更是万分得意。至于这事会有什么后果，则连想都没想。

客车在蜿蜒的公路上徐徐行进，车窗外是一垄垄粉绿色的油菜田，油菜花刚冒出嫩黄。几条水牛在田埂上悠闲踱步。汽车喇叭声划破清晨的宁静，被惊起的小鸟飞快掠过车顶，留下一串清脆的啼鸣。看惯了城市喧嚣嘈杂的我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了。这就是我们将要长期生活下去的地方。

车行至离县城四十里来里的临江镇，还未进站，远远就看到几辆车横在公路上，前后左右都有大群人。不好，可能要坏事了！我的心“格登”一跳。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过来拦住了车，传达上级电话指示：车原地停放，人下来。一阵愤怒的抗议之后，拗不过，全体人员下了车，一起声讨那个可恶的司机。原来我们开走一辆车的消息早经由电话告知了县委，这几辆车就是专门来拦截我们的。

我们刚下车，就被看热闹的人们团团围住，好奇、惊诧的目光，像观看什么动物。这阵势吓不倒咱，什么场面咱没见过！可这剩下的一半路程该怎么办？正在犯愁之际，县革委会的专车来了，接我们到开县。

知青私自“抢”开汽车的事惊动了县领导，总得有人来解决一下。我们被叫到了县革委，一个中年的什么领导接待了我们，问了问情况，批评了几句。我们当然竭力为自己争辩。他哪里说得过我们！也不想想，如果不是文革、不是毛主席号召，谁会来他开县？我们早就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了。毕竟这是知青到开县后第一件轰动性的大事，县里不知该怎么处理，也不想轻易动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于是安排我们住在县招待所。

那时的开县县城不大，一圈烂公路围着两条十字形街道。街道两边房屋多为二层楼和平房，有一些小百货店和食品店，还有一个书店，书架上摆满清一色的“红宝书”。沿街的围墙上用大红油漆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等标语。

我们一行六人毫无目的地在县城闲逛，只用了半个小时就逛完全城。胡乱在街上买了碗面吃，那时的面一角钱一碗。县城的居民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有的在窃窃私语。这不大的县城，打死一只老鼠全城人都会知道。

2010年12月，在阔别41年后我们重返开县，老县城已沉入汉丰湖，只有那棵饱经沧桑的大黄葛树兀立于水面，不知它是否还记得当年知青的荒唐闹剧。

卫生所“抢药”事件

我和陈雪莲、杜金华被分到了金沙公社龙桥八队。刚住下不久，杜金华就生病了。开始以为是一般性感冒，但没几天，她眼睛和脸都肿了，到公社卫生院检查是患了急性肾盂肾炎，需青霉素治疗，要几十元钱的药钱。几十元钱在当时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谁拿得出来呀！看着她的脸和眼睛越肿越大，病情一天天严重，大家都心急如焚。

那个年头的我们，为同学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火中取栗。一天上午我约了同公社的牟寅生等几个男生，闯进公社卫生院，径直到药房拿走了几盒青霉素。我们的行动惊呆了这个偏远山乡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拿了药就叫医生护士给做皮试。

“知青抢药了！”“知青抢药了！”愣了好一阵他们大呼小叫起来。药是给同学注射了，可病情还是没见好转。怎么办，只好送到县人民医院，总算治好了。

抢药事件就这样过去了么？我当时也以为就这样过去了。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想过这件事。但公社领导和卫生院却把这笔账记下了。

就在 1971 年 11 月我即将被招工返城时，公社领导提出要我支付那些青霉素的药钱，总计 50 元，不然不放人。这笔钱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是一般家庭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我返城心切，



信告父母，父母一句话也没说，把钱寄来了。那时，我对公社的做法很是抱怨，认为他们是“秋后算账”。心想，我们知青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有病痛就得国家给治，何况又是为了同学，账怎能算在我头上？文革期间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联，乘车坐船吃住都不掏钱，武斗期间红卫兵抢枪、抢车、抢农村的猪，谁说要钱呐。我为自己找了 100 个抢药的理由，压根儿就没有觉得做错了。（左图：作者当知青时留影。）

几十年后回头看，这难道不是把打砸抢之风带到农村来了么？医治同学的病难道不能有其他办法么？我当时还习惯于“红卫兵思维”，习惯于“造反有理”，还不懂得“造反有理”的时期早已结束了。

一个特殊的知青群体

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是那个年代的时代潮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催化，更成了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一代青年的主要精神特征，这一特征在我们金沙公社知青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金沙公社集中了文革中我校“八一五”派的部分骨干。我们这一群人自我感觉良好，“身在茅屋，心怀天下”。不仅记住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更记住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最高指示。我们这个群体有这样一些表现——

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聚会。我们公社的知青常常聚会，聚会的主题永远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的新动态，四川、重庆两派的近况，知青的现状和相关信息。龙桥2队、4队和我所在的8队经常是聚会的地点。龙桥大队的地形酷似一口大锅，各队散布在这口锅的周围，而我所在的8队恰好处在这口锅的出入处。赵立天、田福祥、邓开荣所在的3队是全大队的最高点，站在3队放眼望，龙桥尽收眼底。座座小山，层层梯田，丛丛竹林，家家农舍掩映在缥缈的轻烟里。龙桥1队和龙泉大队接壤处有村校，白色围墙在满目葱茏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1969年8月15日是重庆“八一五”派造反三周年纪念。

“我们十几个同学聚集在龙桥2队解洪、邹大鹏家，吃羊肉、吃桐梓树叶裹着蒸的新鲜包谷粑。月光下，院坝里，回忆革命造反历程，满怀深情高唱文化革命时的战歌：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又唱：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练红心，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激情洋溢的歌声传出好远好远。”（摘自我的知青日记）

这种聚会，几乎成了我们当年的精神寄托。

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作用。刚下去时，公社领导和社员对知青不了解，又因为我们是下乡第一天集体“造反”来到金沙公社的，以为我们只会闹事，只会和他们作对。后来渐渐发现，这批知青文化基础好，思想活跃，信息广，能写会说，有才华的人真不少，于是逐步注意发挥知青的作用：宣传毛泽东思想、传

达贯彻中央文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办学习批判专栏、斗争“民主自由党”（当时农村里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成员、开展农业学大寨、组织文艺宣传队、篮球队等，知青都成了骨干。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我们配合公社革委会组织社员学习宣传“九大”精神，教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黄北极、范福琪同学因为能写会画，还被请到邻近的几个大队去做“忠字品”：用五色谷物粘成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牌等，受到社员们的欢迎。到其他大队做这些，人家管饭，请吃大肉，知青也很乐意。

中央关于知青再教育工作文件精神，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当时一直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创举。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段，是继续革命的加油站。”（摘自我的1970年日记）。为配合再教育工作，展现金沙公社知青整体形象，1970年3月开始，我们办了油印刊物《再教育通讯》，刊登知青们的稿件。第四期是诗歌专辑。邹大鹏写了前言，解洪创作了近20首诗歌，范福琪设计了封面并刻印。

前言中豪迈地写道：

“金沙公社六十五名重庆一中的知识青年，正在用晶莹的汗珠、火样的热情，创造着这沸腾、多彩的战斗生活。到我们生活中来走一走吧！龙泉大队的崖石上，革命大标语鳞次栉比；龙桥大队的山岗上，红色宣传员把党中央的声音向八方传播；新民大队送公粮的队伍里，我们踏着晨露行进；金沙大队的试验田里，播种的小麦正抽芽吐绿”。（见《再教育通讯》第四期）。

在生产劳动中争挑重担。我们公社的知青劳动也是一把好手，都以争挑重担、吃苦耐劳为荣，虚心学习各种农活和农业技术。

杀牛，给男知青们提供了一个表现英雄气概的好机会。农村里通常是把年老、丧失了生存能力的老牛宰杀掉。一次龙桥4队杀的就是一条老水牛。知青黄北极、范福琪、范福海参与了。事后黄北极绘声绘色给我们女生讲述了宰牛全过程：

先用一根绳子把牛的一条腿绑住，让牛绕着绳子走圈儿。几圈后，牛的四条腿就被绳子捆住了。稍用力一推，牛四脚朝天倒在了地上，水牛的两只角刚好抵住了地面，动弹不得了。随即拿来两根杠子，一根穿过牛的前腿，另一根横在中间，把牛的身子固定好。这时主刀的人拿来一把长弯刀，先割开牛脖子的皮，牛血就从脖子处喷射出来。马上拿来一个水瓢扣在牛脖子上，防止牛血喷得到处都是。到血流得差不多了，就用砍刀把头整个砍下来。这个过程全是几个知青操作的。因为知青胆大，又是外地人，没有顾忌。杀牛通常在堰塘坎上，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社员，大呼小叫声连同牛的哀嚎不绝于耳。有小孩子在说，看哪看哪，牛哭了！几个女子探头看过去，果然看到有浑浊的泪水从牛的眼睑慢慢流下来。

可那年头，谁还在乎牛的悲情呢。杀牛既显示了知青的勇气，还可照当地的规矩，多分得几斤肉，何乐而不为！我们听了，既惊讶又亢奋又羡慕。

开展知青串联，加强知青联系。这是我们的另一项群体性活动，铁桥区的各个公社我们都去过，去串连的几乎全是男生，通常我成为唯一的女生。串联知青的到来总给所在队上的同学带来惊喜，带来新鲜信息，带来了友情和欢乐。

对于知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分家、打群架、偷鸡摸狗、不参加农业劳动、乱交异性朋友、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等等，我们这一群人也常在一起议论、探讨，相互鼓励，该抵制的抵制，该反对的反对。即使在最困难最消沉的时候，多数知青的道德底线和思想底色没有改变，始终坚持了团结，保持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坚守了善良正直的品质。只是今天来反思，不得不承认，当年我们这一群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下乡前的红卫兵水平，自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我们，在那段岁月里，从来没有怀疑过知青运动本身，没有怀疑过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怀疑过伟大领袖。

1971年3月初，首批返城的同学要走了，送别他们后，我在日记中写道：

“两年来，我们金沙公社的许多同学，始终生活战斗在一个革命的大集体中，这个革命的战斗的集体曾教会了一些天真幼稚的同学怎样敢于生活、善于生活。如今，这个集体就要分离了，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伟大功勋永远不会磨灭。”

昧心的咸菜和挂面

1970年春，一大早，我们和社员一起扛着锄头到坡上挖包谷地。包谷地是冬天收了红薯的地，稍稍翻动后春天就开始点包谷。挖地的都是妇女。大家都分外小心地挖着，因为在挖地时，常常会意外发现泥土中突然冒出一两个前一次没有挖干净的红苕。在那个吃饭成大问题的年代，人人的喉咙都像伸出了爪子，除了我们几个知青，女社员们都想这样的运气落到自己头上。我们挖几锄头站一会儿，闲聊几句，就这样打发一上午的光阴。

突然，我旁边的一中年妇女异常兴奋起来，只见她眼睛发亮，小心翼翼地地上捡起一个一寸多长的小红苕，用力拍打，又掀起衣裳角揩干净粘在上面的泥土，然后十分小心地用围裙把它包起来。旁边的几个妇女又羡慕又嫉妒的眼光直射向她。

“怎么，找到红苕啦？放到一块儿，收工后交到队里去！”我发现后大声嚷着。挖到红苕的妇女顿时惊慌失措，但还是舍不得把红苕交出来。

“阶级敌人搞破坏，侵害集体利益！”我们几个知青马上把这件事情提到了

一个高度。本来这个中年妇女就是当地“民主自由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当年，农村里所谓的反动组织）成员的家属，那时又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她这不正好撞到枪口上了。下午开批判会！我马上向队长建议。队长立马答应了，通知当天下午在大晒坝批判这个妇女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把她的“民主自由党”老公也叫来陪斗。

中午收工后回到知青屋，我们忙着做饭。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那个妇女的女儿）来到我们屋门前，手里端着一土碗，脸胀得通红，嗫嚅着说：“我妈叫我给——你们，送——”我抬眼一看，碗里有被盐水浸泡得红红的萝卜、泛着绿色的青菜，还有水盐菜，都是我们喜欢的。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正值春荒时节，神仙难过正二三月，我们早没菜了。这可是雪中送炭哦！可今天下午的会怎么办，这碗咸菜该不该收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该收，但另一个更强劲的声音说，收下吧，今天中午已经没有菜下饭了。到底还是欲望战胜了“原则”，我接过她的碗，把菜腾出来，把碗还给了她。她迟疑着蹒跚而去。

下午的批判会照常进行。这个妇女和她老公萎缩地站在晒坝中，耷拉着脑袋。我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义正辞严地批判她“损害集体利益的罪行”，还一边带领社员呼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毕竟收受了一碗咸菜的贿赂，批判的火药味多少降了点温。在发言的过程中，我几次瞥见这个妇女用哀求的目光胆怯地瞟着我，我心里也有些理亏，总觉得自己的发言不硬气。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口软，但我并不担心她揭发送咸菜的事，如果真那样，我就说她是用咸菜腐蚀知青，想减轻自己的罪过，那她岂不是罪上加罪？她的未成年的女儿可怜巴巴地站在院坝一角，头发蓬乱，眼光凄迷惶惑。

以后的几十年里，这碗咸菜一直压在我心上，我眼前老是浮现着那个小女孩悲苦惶恐的目光。在我记忆中她就从来没有笑过。2010年重返龙桥，看着他们家的老屋基，我在心里问：他们一家人去哪儿了，那个眼光凄迷的女孩，还有她那个更小的弟弟，后来过得好吗？当年的我，现在的我，真的能够帮上他们么？

如果说这一碗咸菜是我平生收受的第一份“贿赂”，而那两把挂面，则是我今生送出去的第一份不光彩的“礼”。

那是1971年，下乡的第三个年头。开始招工了。知青中因为返城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冲突。我在3月的日记中写道：

“盼啊盼啊，怎么才能尽早回到重庆回到家乡，几乎成了所有知青的心病。”

我们三个女知青一家，陈雪莲和杜金华都是工人出身，家里子女多，生活较困难，杜金华同学的父亲刚刚去世。1971年上半年陈雪莲去了部队工厂后，重庆二钢厂来招工了。我想杜金华如果能早点走，既可以解决他们家里的困难，也能为我早点离开农村创造条件。她俩都比我年纪小，那个年头的我，英雄主义情

结严重，并不想只顾自己而把她独自留在乡下。可我们这个知青户刚走了一个，这次公社还会考虑我们么？思前想后，我想到了给公社领导送点礼。

严书记分管知青工作，他家孩子多，老婆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相当困难。于是，就想给他送挂面。挂面是那时的稀罕物，当地农村接待珍贵的客人，都是给客人下挂面，最好的还搁上一两个煎鸡蛋。怎么送去？白天人很多，影响不好。就晚上吧。

趁着一个月黑夜，我早早吃了晚饭，挎着军用书包，用报纸包了精心准备的两把挂面，悄悄出了家门。我的知青家离公社有五里路，是可以开拖拉机的土路，如果走得快，半小时就能到。月亮没有出来，农舍的油灯似鬼火闪烁。那年头的我从来不怕一个人走夜路，我大步流星走着，可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怕的是碰到熟人，怕找不到严书记，还怕他不收礼，又怕送了礼事情反而没办成……而最大的心理纠结来自道德上的自我谴责：明明知道送礼不对，是与党多年的教育背道而驰的，但为了早点出农村，一向唱高调的我竟然干起了这个……思想上不能说服自己，但事情似乎又只能这样做下去。边走边想，走到了公社那条背街上。

临近书记家门，我的心一阵慌乱，万一他不在家，万一他拒绝，万一……顾虑太多太多。终于鼓足勇气上前敲门，豁出去了！还好，严书记在家。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来意，他没有推辞，接过了挂面。我赶紧说，这次公社推荐返城知青，我想我们家的同学能够走，她家里有困难……严书记明白了我的意思，点点头。

之后，杜金华同学终于进了重庆特殊钢厂。不久我也调回了重庆。我们一家是公社知青户中最早关门的。

小黑狗那一声哀嚎

和不少社员一样，我所在的知青户也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我们叫它小黑。它刚生下来就到了我们家，它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忠诚地看门护院，逗趣玩耍，给我们平淡乏味的生活增添了无数快乐。每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知青屋时，小黑总像迎接久别的亲人般从屋里飞奔出来，对着我们摇头摆尾，热情的眼光盯着你，用嘴蹭你的裤管。更让人惊诧的是，小黑很会识别人，它分得出哪些是知青哪些是农民。知青来了，它知道是我们的同伴，总是摇尾巴，而农民来了，它最爱汪汪叫个不停。“这狗真是知青的呀！”社员们都这样说。

今天的人无法想象在那个“形势大好”的年代，食物有多么匮乏，知青们在农村，难得吃上一顿肉食。自己养的猪都要交一半给供销社。没有粮食，猪也长不好，喂上100来斤重就算是大的了。普通农民家里，就是靠一年杀一头猪来解

决全年的肉、油需要。把肥肉和猪油切成小块放在土罐里，每次炒菜小心翼翼地取一小点出来在铁锅里抹抹，就算是放了油了，一丁点儿的油香味就让人馋得要命了。农民们养狗、养鸡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知青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对肉食的需求更是难以抑制。

我们的小黑全然不知这些，它渐渐长成一只大狗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群知青同学来到我们家。好久没有油水进肚子了，喉咙都快伸出爪子了。有人提议，打狗！对，杀小黑！我们也赞成。于是把小黑唤到身边。小黑忠诚地召之即来，一个男知青抡起木棒，劈头朝小黑打去。小黑开始一愣，惶然不知所措，后来明白了，它晶亮的眼睛里饱含哀怨。又是一棒打过去，小黑发出了一声哀鸣，跑开了。我们的同学没有放过它，又冲上前，对准它的头部又是一下猛击，小黑倒在地上了，它也许到死也不明白，主人为何见死不救，为何如此对它……

我们在门前的树枝上把小黑挂起来，剥了皮，一半狗肉拿来红烧，一半拿来炖萝卜汤。十几个知青美美吃了一顿。

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几乎没有想过这事，也不曾认为有什么不对。我把这当成一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哪知多愁善感的女儿听了后哀怨地说，妈妈吃了狗狗，太坏了！我听了女儿的话，还嗔怪女儿少见多怪，没有饿过饭，不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

知青们打狗杀狗是普遍行为，还不止于此呢，曾经到一个男同学家里去，他们说，你们几个女生来尝尝这是什么肉。我们不明就里，看见桌上的一碗红烧肉，就伸筷子夹了一点在嘴里，还是不知是什么。男同学得意而神秘地笑笑说，猜不出吧？是猫肉。当时也没把这放在心上。可这些年里每每想起这事，就觉得自己真恶心。

一次看一本写云南知青的小说，说一天晚上知青们遇到一群野兽围住了帐篷，也许是野兽嗅出帐篷内有狗的味道，不肯离去，在外狂叫。眼见大家的生命安危都成了问题，有人提议把狗扔出去。狗的主人提着木棒说，谁敢这样，我和他拼了！看到这里我为之动容。

2010年重返知青屋，看着满院子生龙活虎的猫狗，想起那些年每当收工回来，小黑围着我们连蹦带跳、一个劲摇尾巴的亲热劲，想起小黑倒在地上时那晶亮而不解的眼神，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们那些年怎么变成了那样？

从红卫兵到“女汉子”

“女汉子”是当今用语。通常指言行表现向男性接近、缺少女人味的一类女性。这

个词多少带有贬义。可那个时代宣扬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歌颂的是“铁姑娘”，那时的我，也就刻意将自己摔打磨练成一个女汉子。

少年时的我，温顺听话，梳着一对长辫子，是学校的好学生，家里的乖孩子。进入中学后，我就剪掉了美丽的长辫子，打从文革开始，我就不把自己当女性看。毛主席的教导鼓舞着我：“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我想和男人一样投身时代风云，做大事，干革命。文化革命中我的红卫兵形象和思维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冲锋在前，誓死捍卫，长期在学校坚持战斗，成了一中“八一五”派女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从最初的打黑帮、破四旧到一月夺权、文攻武卫，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紧跟毛主席，武斗激烈期间我甚至给父母写下了告别信，给毛主席写了遗书（文革中的经历将是另一文章的内容）。

外表上，我当时的形象倾向于男性化，留短发，穿青蓝二色衣服，脚上一双军绿色解放鞋，一则因为家穷，二则刻意为之，想使自己更革命。对一些女生讲究打扮，显得娇气、秀气，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小姐”作派，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我原本肤色较白，到农村后觉得那样和贫下中农很有距离，于是写信叫父母为我买了一条运动型短裤，夏天穿上，到田地里干活顶着太阳暴晒，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黑黢黢，心中很得意。一次我穿着短裤和几个男生去铁桥赶场，露出晒得黝黑的大腿，全然不在乎一路上社员们惊诧的目光。

当地女子一般都不下田，栽秧拔谷子都是男人的事。在我的鼓动下，我们队的三个女生却执意要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队里拗不过，同意我们下田栽秧拔谷。即使是女性的特殊期，我们也不顾生理因素，照样下田，照样干重活，并以此为荣。

当地女子都不穿草鞋，不拿打杵（一种人挑担时的辅助工具），更不会上南山挑煤。可我们三个却不示弱，一样上山。我穿草鞋，拿打杵，倒不是作秀，而是走起路来草鞋最跟脚，用打杵挑担子更轻松。每次都挑着 60 来斤重的担子走几十里山路，饿了吃自带的红薯、包谷粑，渴了喝山涧的泉水。有男同学提出为我们挑煤，我们连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还有一件事也充分体现了我的女汉子作风。每年春节回家知青都要给家人带些食物，通常是腊肉、鸡、红苕粉等。有一年我给家里准备了 5 只鸡，一天上午，我把这 5 只鸡全杀了，洗净晒干，准备拿回家。由于没有掌握杀鸡的技巧，只能硬杀。接连杀了 4 只后，还有一只最大的公鸡等待就刑。我左手提起公鸡的翅膀，右手稍稍扯了几下鸡脖子上的绒毛，然后拿起刀对着鸡脖子就是一下。也许是刀钝了，也许是我没有劲了，那只 5 斤多重的大公鸡挨了一刀后并没有断气，我刚把它放下，它竟然又张开翅膀在院子里扑腾起来，一边跑一边“咯嗒咯嗒”

乱叫，鲜血洒了一地。我没有犹豫，紧跟几步捉住它，一刀下去，索性把鸡头砍下来了。若干年后回想这一幕，真不知当年哪来的那股子蛮劲和狠劲。

这样的观念和追求，使我比一些男生还冲动，还好表现。当知青三年中，铁桥区知青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几乎都知道，都参与，可谓“十处打锣九处在”：下乡第一天的集体“造反”、飞车闯开县、开江打群架（我参与事后的对策研究）、开展革命大批判、观看枪毙“民主自由党”成员、到堰塘游泳……我总是和男生们结伴而行，拿男生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也总是把我当哥们、当兄弟伙看待。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接受阶级斗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认为积极、极左、敢于造反就是革命，就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就能体现出人生最大的价值。我在1970年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战斗在这样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是多么的荣幸啊！虽然我们没有参加夺取全国政权的铁与血的战斗，没有赶上那万水千山的长征，但是，我们赶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我们赶上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成为威慑世界的第一代红卫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旗，血染的红旗啊，要由我们接过来传下去，把它插到共产主义的高峰上。”

深究思想根源，是因为知识贫乏，盲从、愚昧、好走极端，于是越左越革命，越无知越无畏。

我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父亲，对自己女儿的缺陷看得很清楚。1971年底铁桥区刘启成等几位当地领导到我家说起知青在铁桥的情况，父亲笑呵呵地说：“我的女儿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时至今日，我有时想，如果没有了那时盲目的信仰，没有了对物质生活的鄙薄和对政治理想的热切向往，没有了虚妄的精神支撑，我和许多知青可能很难走过那段艰难的路程，我们的精神或许会空虚、颓废、绝望……荒谬与真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竟如此荒诞地结合在一起。

后来的几十年里，我逐渐重塑女性意识，回归女性角色，回归人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思想和精神历程。

如果生活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命运可以选择，我绝不会再选择当知青。

2015年3月

【友情链接】

文革前大巴山重庆老知青 下乡五十周年纪念会致词 (2014年12月31日)

邓 鹏

作者简介：邓鹏，1964年重庆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同年10月下乡到四川省万源县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务农。1971年调达县地区万福铁厂。1978年考上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次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85至1990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获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近年致力于抢救历史的民间记忆，其主编的《无声的群落——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回忆录》和《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于2006、200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英语选译本也即将由Brill出版社出版。

亲爱的老知青兄弟姐妹们，亲爱的知二代和在场的其他朋友：

今天，公元2014年12月31日，我们在这里聚会，隆重纪念1964、1965两年间到原四川省达县地区落户的重庆知识青年下乡五十周年。首先，我谨代表纪念会筹备组对在场的所有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感谢你们不畏严寒和道路的拥堵来到锦绣山庄，跟我们一起纪念这个对130万中国公民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

接到致词这个任务时，我兴奋之余却感到几分踌躇。踌躇的原因是，今天的聚会不比往常。纪念五十年前的一个决定我们人生轨迹的事件，回顾我们半个世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某种见证。虽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虽然历史的本体是一种坚硬的存在，对历史的认识 and 解读却常常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活动。所以下面的一番话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与大家分享，希望引起一些共鸣。

邹克纯老兄为今天的聚会取了一个韵味无穷的名字：大巴山：春秋长歌。春秋者，人生也，历史也。大巴山，我们这群人的第二故乡也。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跟大巴山有一种预约；我们的人生是一首跌宕起伏的长歌。

一位诗人说，“人生如戏偶安排。”我们这帮人之所以今天在这里聚会，归根结底是因为五十年前，由于命运的差遣，在座的人自愿、半自愿或被迫地参加了一个用胡耀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一个李先念先生所说的“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的运动；一个以“兵败如山倒”告终的运动。还需要点明的是，五十年前，当我们登上一辆辆带篷的解放牌卡车，告别山城重庆的时候，心里除了幼稚的乌托邦狂想之外，也许还有一丝难言的苦涩：我们当中许多人是学校里的品学兼优、最拔尖的学生，在最渴求知识的时候，却被一条既不地道、又不明智的政策无端地

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诡谲的历史让我们成为一帮“被放逐的朝圣者”。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我们这一批曾经在大巴山区生活、劳动过的人来说，大巴山的经历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本人在大巴山区生活了14年，大巴山的经历构成我的人格的一些基本元素。没有大巴山的经历，我也许永远不知道怎么种地、不知道种地需要弯刀、月亮锄、点锄；不知道怎样使用“花篮”、“背架”和打杵；不知道火坑、鼎罐、烘笼子和石碾；不知道砍火地、刮灰，烧瓦；不知道水红籽可以充饥，“九月香”的美味妙不可言；也不知道吃饭应该说“qie”饭，“哦呢”的意思是yes；不能说“烧火”，只能说“传火”……我们更不会认识大巴山的那些纯朴、善良、勤劳的父老乡亲。我们茶场的指导员邱占富先生在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时候，吩咐他的儿子将一袋他亲手采集、亲自加工的天麻交到我手上。《无声的群落》里面有一篇题为《一句受益终身的话》的文章，寥寥数百字，作者是巴中的老知青熊开达。1968年冬季的某一天，作者不慎掉进了一个水塘，爬出来后，又冷又饿，无比沮丧。一位老农民请作者到他家里，让他饱餐一顿之余，还宽慰、鼓励他说：“那娃儿，不咋地。”这句话鼓舞了作者一辈子，也曾经让我热泪盈眶。

就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感念大巴山，感念大巴山给予我们的一切。无论你在大巴山区的时间长短，那巍巍莽莽的群山都曾经是你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使我感到三生有幸的是，六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空前绝后的政治歧视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在座的朋友。你们个个都有杰出的父母，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出色的才华、活跃的思想。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些年月，我们结下了兄弟姐妹一样的情谊。因为友谊，我们从此不再孤单，不再自怜。我们互相帮衬、互相激励，不少朋友还由大巴山撮合，结成了终身伴侣。

我至今忘不了这样的往事：1970年春荒三月，我们插队落户在新店乡挂鼓岩的三个小伙子青黄不接，面临饥饿的威胁。草坝公社三大队老鹅梁的王永楠大哥及其麾下的六个兄弟姐妹知道我们的困境之后，立马送给我们一大夹背金灿灿的谷子；冬天的草坝，北风呼啸，一派萧索，家家关门闭户。但我们知道，有一扇门总是对知青敞开的，有一间小屋里总是春意盎然，那就是草坝唯一的那条街尽头的区税务所，小屋的主人是我们那位“不是知青，胜似知青”的吴霆大哥……

几十年来，我们珍视这份友谊，我们用真诚和爱呵护这份友谊，使它像陈年的佳酿，一年更比一年甘醇。我本人去国多年，这些年来故乡的许多变化常常让我感到陌生。但是在朋友当中，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南江的老知青贺岩说得好，“一日下乡，终生知青。”诚哉斯言！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1964

年那个多雨的秋天在万源县新店乡青山坪的崎岖山路上摔得浑身是泥的 16 岁的少年，永远是那个在大巴山里生活了 14 年的老知青。

“老知青”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只有在“老知青”这个称谓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最稳定、最持久的社会属性。正是因为这种缘分和对这种缘分的珍惜，我和在座的一些朋友才会在过去的 12 年时间里义无反顾地组织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的编撰和出版，并且在过去的几年中将老知青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如今这部英文书稿通过审阅、编辑，已经发排，不久将面市。通过一家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欧洲出版社 Brill 将文革前老知青的经历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让老知青这个群体的追求、迷惘、觉醒、奋斗、牺牲及其背后的历史与世界文明共存；让今天在场和不在场、甚至已经离我们远行的兄弟姐妹的故事进入中华民族的编年史，乃是包括在座的许多朋友的共同愿望和坚定信念。

今天到会的兄弟姐妹们的生活道路各不相同，大家都经历了许多坎坷。由于多种历史原因，文革前老知青是一个被牺牲、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作为一个群体，文革前知青过去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今天在迅速地淡出中国社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努力、没有忘记跟大巴山之间无可更改的预约。文革前知青始终是一个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甘于清贫、勇于奉献的群体，是一群大写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愧于列祖列宗，也无愧于子孙后代。

生我养我者父母也。随着年齿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特别是超越极权制度的思想禁锢之后，我们才真正知道感念自己的父母，认识到我们的父辈的精神世界。从民国走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儒雅、良知和操守让我们永远高山仰止，永远缅怀。他们是当代中国一道最瑰丽的风景线。可惜我们的父辈所展现的精神谱系经过一场暴力革命的风吹雨打，如今所剩无几。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遭受的最大劫难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在追怀父辈的高风亮节的同时，将他们的经历和对我们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诉诸翔实的文字，那就不仅是对父母和其他长辈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而且也有助于廓清中国现代历史的诸多疑难和混乱，开启民智，并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

2014 年即将过去，几个小时之后，2015 年就将如期而至。我们将以发自心灵的音符和来自生命之源的律动辞旧迎新，声明我们的顽强存在。虽然时光在流逝，老知青的精神依然不减当年。

衷心祝愿在座的所有兄弟姐妹青春常在，衷心希望大家记住今天的聚会，记住它，直到永远。

【旧曲重听】

曾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大案的《南京知青之歌》

按：《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 66 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 1969 年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这首歌很快传到全国许多有知青的地方。甚至传到了苏联，莫斯科电台作了广播。1970 年 2 月，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的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被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逮捕。先判死刑，后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任毅平反后著有《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

南京知青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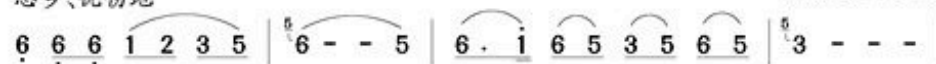
独 唱

1=C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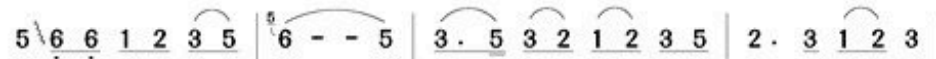
♩ = 100

思乡、忧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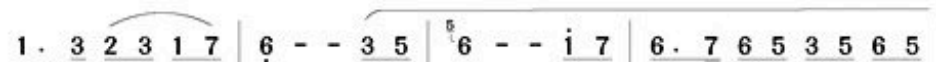
佚 名 曲
任毅 记谱填词
颂今 整理改编



蓝 蓝 的 天 上， 白 云 在 飞 翔，
告 别 了 妈 妈， 再 见 了 家 乡，
跟 着 太 阳 起， 伴 着 那 月 亮 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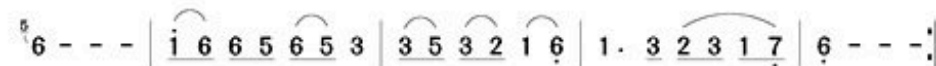
美 丽 的 扬 子 江 畔 是 我 可 爱 的 南 京 古 城
金 色 的 学 生 时 代 已 载 入 了 青 春 史 册
沉 重 地 修 理 地 球 是 光 荣 而 神 圣 的 天 职



我 的 家 乡。 啊……
一 去 不 复 返。 啊……
我 的 命 运。 啊……



长 虹 般 的 大 桥 直 插 云 霄 横 跨 长
未 来 的 道 路 多 么 艰 难 多 么 漫
用 我 们 的 双 手 绣 红 地 球 赤 遍 宇



江， 威 武 的 钟 山 虎 踞 在 我 的 家 乡。
长， 生 活 的 脚 步 深 浅 在 偏 僻 异 乡。
宙， 憧 憬 的 明 天 相 信 吧 一 定 会 到 来。

另附歌曲音频资料，由马昌海提供。